

魯正：三閔集



魯迅三集

三集

18.



著者魯

迅

編纂者 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
出版者 魯迅全集出版社
發行者 魯迅全集出版社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月十月初版

每部定價 國幣三十六元

魯迅三十一年集

18

三 閒 集

一九二九年著



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印

原书空白

目次

三閒集

序言

——一九二七年——

無聲的中國

怎麼寫（夜記之一）

在鐘樓上（夜記之二）

辭顧頡剛教授令『候審』（井來信）

匪筆三篇

四

二

三

三

一

七

某筆兩篇..... 五一

述香港恭祝聖誕..... 五四

弔與賀..... 五九

——一九二八年——

「醉眼」中的朦朧..... 六四

看司徒喬君的畫..... 七二

在上海的魯迅啓事..... 七五

文藝與革命（井冬芬來信）..... 七六

扁..... 八九

路..... 九一

頭..... 九三

通信（井Y的來信）..... 九五

太平歌訣..... 一〇五

劃共大觀..... 一〇七

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	110
革命咖啡店	117
文壇的掌故（井徐勻來信）	110
文學的階級性（井愷良來信）	115

——一九二九年——

「革命軍馬前卒」和「落伍者」	110
「近代世界短篇小說集」小引	111
現今的新文學的概觀	114
「皇漢醫學」	110
「吾國征俄戰史之一頁」	113
葉永蓀作「小小十年」小引	116
柔石作「二月」小引	115
「小彼得」譯本序（文略，見第十四卷本書。）	111
流氓的變遷	111

新月社批評家的任務·····	一五
書籍和財色·····	一七
我和「誦絲」的始終·····	一六〇
魯迅譯著書目·····	一七三

序 言

我的第四本雜感而已集的出版，算起來已在四年之前了。去年春天，就有朋友催促我編集此後的雜感。看看近幾年的出版界，創作和翻譯，或大題目的長論文，是還不能說牠寥落的，但短短的批評，縱意而談，就是所謂「雜感」者，卻確乎很少見。我一時也說不出這所以然的原因。

但粗粗一想，恐怕這「雜感」兩個字，就使志趣高超的作者厭惡，避之惟恐不遠了。有些人們，每當意在奚落我的時候，就往往稱我爲「雜感家」，以顯出在高等文人的眼中的鄙視，便是一個證據。還有，我想，有名的作家雖然未必不改換姓名，寫過這一類文字，但或者不過圖報私怨，再提恐或玷其令名，或者別有深心，揭穿反有妨于戰鬪，因此就大

抵任其消滅了。

『雜感』之于我，有些人固然看作『死症』，我自己確也因此很喫過一點苦，但編集是還想編集的。只因爲翻閱刊物，剪帖成書，也是一件頗覺麻煩的事，因此拖延了大半年，終于沒有動過手。一月二十八日之夜，上海打起仗來了，越打越凶，終于使我們只好單身出走，書報留在火線下，一任牠燒得精光，我也以可靠這『火的洗禮』之靈，洗掉了『不滿于現狀』的『雜感家』這一個惡證。殊不料三月底重回舊寓，書報卻絲毫也沒有損，于是就東翻西覓，開手編輯起來了，好像大病新愈的人，偏比平時更要照照自己的瘦削的臉，摩挲枯皺的皮膚似的。

我先編集一九二八至二九年的文字，篇數少得很，但除了五六回在北平、上海的講演，原就沒有記錄外，別的也彷彿並無散失。我記得起來了，這兩年正是我極少寫稿，沒處投稿的時期。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嚇得目瞪口呆，離開廣東的，那些吞吞吐吐，沒有膽子直說的話，都載在而已集裏。但我到了上海，卻遇見文豪們的筆尖的圍剿了，創造社，太陽社，『正人君子』們的新月社中人，都說我不好，連並不標榜文派的現在多昇爲作家或教

授的先生們，那時的文字裏，也得時常暗暗地奚落我幾句，以表示他們的高明。我當初還不過是「有閒即是有錢」，「封建餘孽」或「沒落者」，後來竟被判爲主張殺青年的棒喝主義者了。這時候，有一個從廣東自云避禍逃來，而寄住在我的寓裏的廖君，也終于忿忿的對我說道：「我的朋友都看不起我，不和我來往了，說我和這樣的人住在一處。」

那時候，我是成了「這樣的人」的。自己編着的語絲，實乃無權，不單是有所顧忌（詳見卷末我和語絲的始終），至于別處，則我的文章一向是被「擠」纔有的，而目下正在「剿」，我投進去幹什麼呢。所以只寫了很少的一點東西。

現在我將那時所做的文字的錯的和至今還有可取之處的，都收納在這一本書裏。至于對手的文字呢，魯迅論和中國文藝論戰中雖然也有一些，但那都是峨冠博帶的禮堂上的陽面的大文，並不足以窺見全體，我想另外搜集也是「雜感」一流的作品，編成一本，謂之圍剿集。如果和我的這一本對比起來，不但可以增加讀者的趣味，也更明白別一面的，即陰面的戰法的五花八門。這些方法一時恐怕不會失傳，去年的「左翼作家都爲了盧布」說，就是老譜裏面的一着。自問和文藝有些關係的青年，仿照固然可以不必，

原书缺页

篇講演和通信中所引的文章，便足可明白那時香港的面目。我去講演，一共兩回，第一天是老調子已經唱完，現在尋不到底稿了，第二天便是這無聲的中國，粗淺平庸到這地步，而竟至于驚為「邪說」，禁止在報上登載的。是這樣的香港。但現在是這樣的香港幾乎要遍中國了。

我有一件事要感謝創造社的，是他們「擠」我看了幾種科學底文藝論，明白了先前的文學史家們說了一大堆，還是糾纏不清的疑問。並且因此譯了一本蒲力汗諾夫的藝術論，以救正我——還因我而及于別人——的只信進化論的偏頗。但是，我將編中國小說史略時所集的材料，印為小說舊聞鈔，以省青年的檢査之力，而成仿吾以無產階級之名，指為「有閒」，而且「有閒」還至于有三個，卻是至今還不能完全忘卻的。我以為無產階級是不會有這樣鍛鍊周納法的，他們沒有學過「刀筆」編成而名之曰三閒集，尙以射仿吾也。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之夜，編訖并記。

原书空白

一九二七年

無聲的中國

——二月十六日在香港青年會講——

以我這樣沒有什麼可聽的無聊的講演，又在這樣大雨的時候，竟還有這許多來聽的諸君，我首先應當聲明我的鄭重的感謝。

我現在所講的題目是：無聲的中國。

現在，浙江、陝西，都在打仗，那里的人民哭着呢還是笑着呢，我們不知道。香港似乎很太平，住在這裏的中國人，舒服呢還是不很舒服呢，別人也不知道。

發表自己的思想、感情給大家知道的是要用文章的，然而拿文章來達意，現在一般的中國人還做不到。這也怪不得我們；因為那文字，先就是我們的祖先留傳給我們的可

怕的遺產。人們費了多年的工夫，還是難于運用。因為難，許多人便不理牠了，甚至于連自己的姓也寫不清。是張還是章，或者簡直不會寫，或者說道：Chang。雖然能說話，而只有幾個人聽到，遠處的人們便不知道，結果也等于無聲。又因為難，有些人便當作寶貝，像玩把戲似的，之乎者也，只有幾個人懂，——其實是不知道可真懂，而大多數的人們卻不懂得，結果也等于無聲。

文明人和野蠻人的分別，其一，是文明人有文字，能够把他們的思想，感情，藉此傳給大眾，傳給將來。中國雖然有文字，現在卻已經和大家不相干的，用的是難懂的古文，講的是陳舊的古意思，所有的聲音，都是過去的，那就是只等于零的。所以，大家不能互相了解，正像一大盤散沙。

將文章當作古董，以不能使人認識，使人懂得爲好，也許是有趣的事罷。但是，結果怎樣呢？是我們已經不能將我們想說的話說出來。我們受了損害，受了侮辱，總是不能說出些應說的話。拿最近的事情來說，如中日戰爭，拳匪事件，民元革命這些大事件，一直到現在，我們可有一部像樣的著作？民國以來，也還是誰也不作聲。反而在外國，倒常有說起中

國的，但那都不是中國人自己的聲音，是別人的聲音。

這不能說話的毛病，在明朝是還沒有這樣厲害的；他們還比較地能夠說些要說的話。待到滿洲人以異族侵入中國，講歷史的，尤其是講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殺害了，講時事的人自然也被殺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間，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來說話了。所謂讀書人，便只好躲起來讀經，校刊古書，做些古時的文章，和當時毫無關係的文章。有些新意，也還是不行的；不是學韓，便是學蘇。韓愈、蘇軾他們，用他們自己的文章來說當時要說的話，那當然可以的。我們卻並非唐、宋時人，怎麼做和我們毫無關係的時候的文章呢。即使做得像，也是唐、宋時代的聲音，韓愈、蘇軾的聲音，而不是我們現代的聲音。然而直到現在，中國人卻還要着這樣的舊戲法。人是有的，沒有聲音，寂寞得很。——人會沒有聲音的麼？沒有，可以說是死了。倘要說得客氣一點，那就是已經啞了。

要恢復這多年無聲的中國，是不容易的，正如命令一個死掉的人道：「你活過來！」我雖然並不懂得宗教，但我以為正如想出現一個宗教上之所謂「奇蹟」一樣。

首先來嘗試這工作的是「五四運動」前一年，胡適之先生所提倡的「文學革命」。

「革命」這兩個字，在這裡不知道可害怕，有些地方是一聽到就害怕的。但這和文學兩字連起來的「革命」卻沒有法國革命的「革命」那麼可怕，不過是革新，改換一個字，就很平和了，我們就稱爲「文學革新」罷。中國文字上，這樣的花樣是很多的。那大意也並不可怕，不過說：我們不必再去費盡心機，學說古代的死人的話，要說現代的活人的話；不要將文章看作古董，要做容易懂得的白話的文章。然而，單是文學革新是不夠的，因爲腐敗思想，能用古文做，也能用白話做。所以後來就有人提倡思想革新。思想革新的結果，是發生社會革新運動。這運動一發生，自然一面就發生反動，於是便釀成戰鬪……

但是，在中國，剛剛提起文學革新，就有反動了。不過白話文卻漸漸風行起來，不大受阻礙。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就因爲當時又有錢玄同先生提倡廢止漢字，用羅馬字母來替代。這本也不過是一種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歡改革的中國人聽見，就大不得了，於是便放過了比較的和平的文學革命，而竭力來罵錢玄同。白話乘了這一個機會，居然減去了許多敵人，反而沒有阻礙，能够流行了。

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裡開一個窗，大

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願意開窗了。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時白話文之得以通行，就因為有廢掉中國字而用羅馬字母的議論的緣故。

其實，文言和白話的優劣的討論，本該早已過去了，但中國是總不肯早早解決的，到現在還有許多無謂的議論。例如，有的說：古文各省人都能懂，白話就各處不同，反而不能互相了解了。殊不知這只要教育普及和交通發達就好，那時就人人都能懂較爲易解的白話文；至于古文，何嘗各省人都能懂，便是一省裏，也沒有許多人懂得的。有的說：如果用白話文，人們便不能看古書，中國的文化就滅亡了。其實呢，現在的人們大可以不必看古書，即使古書裏有好東西，也可以用白話來譯出的，用不着那麼心驚膽戰。他們又有人說，外國尚且譯中國書，足見其好，我們自己倒不看麼？殊不知埃及的古書，外國人也譯，非洲黑人的神話，外國人也譯，他們別有用意，即使譯出，也算不了怎樣光榮的事的。

近來還有一種說法，是思想革新緊要，文字改革倒在其次，所以不如用淺顯的文言文來作新思想的文章，可以少招一重反對。這話似乎也有理。然而我們知道，連他長指甲都

不肯剪去的人，是決不肯剪去他的辮子的。

因為我們說着古代的話，說着大家不明白，不聽見的話，已經弄得像一盤散沙，痛癢不相關了。我們要活過來，首先就須由青年們不再說孔子、孟子和韓愈、柳宗元們的話。時代不同，情形也兩樣，孔子時代的香港不這樣，孔子口調的「香港論」是無從做起的，「嗟闕哉香港也」不過是笑話。

我們要說現代的，自己的話；用活着的白話，將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說出來。但是，這也要受前輩先生非笑的。他們說白話文卑鄙，沒有價值；他們說年青人作品幼稚，貽笑大方。我們中國能做文言的有多少呢，其餘的都只能說白話，難道這許多中國人，就都是卑鄙，沒有價值的麼？至于幼稚，尤其沒有什麼可羞，正如孩子對於老人，毫沒有什麼可羞一樣。幼稚是會生長，會成熟的，只不要衰老，腐敗，就好。倘說待到純熟了纔可以動手，那是雖是村婦也不至于這樣蠢。她的孩子學走路，即使跌倒了，她決不至于叫孩子從此躺在牀上，待到學會了走法再下地面來的。

青年們先可以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了一切

利害，推開了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真，自然是不容易的。譬如態度，就不容易真，講演時候就不是我的真態度，因為我對朋友，孩子說話時候的態度是不這樣的。——但總可以說些較真的話，發些較真的聲音。只有真的聲音，纔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須有了真的聲音，纔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生活上。

我們試想現在沒有聲音的民族是那幾種民族。我們可聽到埃及人的聲音可聽到安南、朝鮮的聲音？印度除了泰戈爾，別的聲音可還有？

我們此後實在只有兩條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捨掉古文而生存。

怎麼寫

——夜記之一——

寫什麼是一個問題，怎麼寫又是一個問題。

今年不大寫東西，而寫給莽原的尤其少。我自己明白這原因。說起來是極可笑的，因為牠紙張好。有時有一點雜感，子細一看，覺得沒有什麼大意思，不要去填黑了那麼潔白的紙張，便廢然而止了。好的又沒有。我的頭裏是如此地荒蕪，淺陋，空虛。

可談的問題自然多得很，自宇宙以至社會國家，高超的還有文明，文藝。古來許多人談過了，將來要談的人也將無窮無盡。但我都不會談。記得還是去年躲在廈門島上的時候，因為太討人厭了，終於得到「敬鬼神而遠之」式的待遇，被供在圖書館樓上的一間

屋子裏。白天還有館員，訂書匠，閱書的學生，夜九時後，一切星散，一所很大的洋樓裏，除我以外，沒有別人。我沈靜下去了。寂靜濃到如酒，令人微醺。望後窗外骨立的亂山中許多白點，是叢塚；一粒深黃色火，是南普陀寺的琉璃燈。前面則海天微茫，黑絮一般的夜色簡直似乎要撲到心坎裏。我靠了石欄遠眺，聽得自己的心音，四遠還彷彿有無量悲哀，苦惱，零落，死滅，都雜入這寂靜中，使牠變成藥酒，加色，加味，加香。這時，我曾經想要寫，但是不能寫，無從寫。這也就是我所謂「當我沈默着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

莫非這就是一點「世界苦惱」麼？我有時想，然而大約又不是的，這不過是淡淡的哀愁，中間還帶些愉快。我想接近牠，但我愈想，牠卻愈渺茫了，幾乎就要發見僅只我獨自倚着石欄，此外一無所有。必須待到我忘了努力，纔又感到淡淡的哀愁。

那結果卻大抵不很高明。腿上鋼針似的一刺，我便不假思索地用手掌向痛處直拍下去，同時只知道蚊子在咬我。什麼哀愁，什麼夜色，都飛到九霄雲外去了，連靠過的石欄也不再放在心裏。而且這還是現在的話，那時呢，回想起來，是連不將石欄放在心裏的事也沒有想到的。仍是不假思索地走進房裏去，坐在一把唯一的半躺椅——躺不直的藤

椅子上——上，撫摩着蚊咬的傷，直到牠由痛轉癢，漸漸腫成一個小疙瘩。我也就從撫摩轉成搔，搔，直到牠由癢轉痛，比較地能够打熬。

此後的結果就更不高明了，往往是坐在電燈下喫柚子。

雖然不過是蚊子的一叮，總是本身上的事來得切實。能不寫自然更快活，倘非寫不可，我想，也只能寫一些這類小事情，而還萬不能寫得正如那一天所身受的顯明深切。而況千叮萬叮，而況一刀一鎗，那是寫不出來的。

尼采愛看血寫的書。但我想，血寫的文章，怕未必有罷。文章總是墨寫的，血寫的倒不過是血迹。牠比文章自然更驚心動魄，更直截分明，然而容易變色，容易消磨。這一點，就要任憑文學逞能，恰如塚中的白骨，往古來今，總要以牠的永久來傲視少女頰上的輕紅似的。

能不寫自然更快活，倘非寫不可，我想，就是隨便寫寫罷，橫豎也只能如此。這些都應該和時光一同消逝，假使會比血迹永遠鮮活，也只足證明文人是倣倣者，是乖角兒。但真的血寫的書，當然不在此例。

當我這樣想的時候，便覺得「寫什麼」倒也不成什麼問題了。

「怎樣寫」的問題，我是一向未曾想到的。初知道世界上有着這麼一個問題，還不過兩星期之前。那時偶然上街，偶然走進丁書店去，偶然看見一疊這樣做，便買取了一本。這是一種期刊，封面上畫着一個騎馬的少年兵士。我一向有一種偏見，凡書面上畫着這樣的兵士和手捏鐵鋤的農工的刊物，是不大去涉略的，因為我總疑心牠是宣傳品。發抒自己的意見，結果弄成帶些宣傳氣味了的伊孛生等輩的作品，我看了倒並不發煩。但對於先有了「宣傳」兩個大字的題目，然後發出議論來的文藝作品，卻總有些格格不入，那不能直吞下去的模樣，就和雜誦教訓文學的時候相同。但這樣做卻又有些特別，因為我還記得日報上曾經說過，是和我有關係的。也是凡事切己，則格外關心的一例罷，我便再不怕書面上的騎馬的英雄，將牠買來了。回來後一檢查剪存的舊報，還在的，日子是三月七日，可惜沒有注明報紙的名目，但不是民國日報，便是國民新聞，因為我那時所看的只有這兩種。下面抄一點報上的話：

「魯迅先生南來後，一掃廣州文學之寂寞，先後創辦者有做什麼，這樣做

兩刊物。開這樣做爲革命文學社定期出版物之一，內容注重革命文藝及本黨主義之宣傳……」

開首的兩句話有些含混，說我都與聞其事的也可以，說因我『南來』了而別人創辦的也通。但我是全不知情。當初將日報剪存，大概是想調查一下的，後來卻又忘卻，擱下了。現在還記得做什麼出版後，曾經送給我五本。我覺得這團體是共產青年主持的，因爲其中有『堅如』、『三石』等署名，該是畢磊，通信處也是他。他還會將十來本少年先鋒送給我，而這刊物裏面則分明是共產青年所作的東西。果然，畢磊君大約確是共產黨，于四月十八日從中山大學被捕。據我的推測，他一定早已不在這世上了，這看去很是瘦小精幹的湖南的青年。

這樣做卻在兩星期以前纔見面，已經出到七八期合冊了。第六期沒有，或者說被禁止，或者說未刊，莫衷一是，我便買了一本七八合冊和第五期。看日報的記事便知道，這該是和做什麼反對，或對立的。我拏回來，倒看上去，通訊欄裏就這樣說：『在一般 C P 氣燄盛張之時……而你們一覺悟起來，馬上退出 C P，不祇是光退出便了事，尤其值得 C P

氣死的，就是破天荒的接二連三的退出共產黨登報聲明……」那麼，確是如此了。

這里又即刻出了一個問題。爲什麼這麼大相對的兩種刊物，都因我『南來』而『先後創辦』呢？這在我自己，是容易解答的：因爲我新來而且灰色。但要講起來，怕又有些話長，現在姑且保留，待有相當的機會時再說罷。

這回且說我看這樣做。看過通訊，懶得倒翻上去了，于是看目錄。忽而看見一個題目：郁達夫先生休矣，便又起了好奇心，立刻看文章。這還是切己的瑣事總比世界的憂愁關心的老例，達夫先生是我所認識的，怎麼要他『休矣』了呢？急于要知道。假使說的是張龍、趙虎，或是我素昧平生的偉人，老實說罷，我決不會如此留心。

原來是達夫先生在洪水上有一篇在方向轉換的途中，說這一二次的革命是階級鬭爭的理論的實現，而記者則以爲是民族革命的理論的實現。大約還有英雄主義不適宜于今日等類的話罷，所以便被認爲『中傷』和『挑撥離間』，非『休矣』不可了。

我在電燈下回想，達夫先生我見過好幾面，談過好幾回，只覺他穩健和平，不至于得罪于人，更何況得罪于國。怎麼一下子就這麼流于『偏激』了？我倒要看看洪水。

這期刊，聽說在廣西是被禁止的了，廣東倒還有。我得到的是第三卷第二十九至三十二期。照例的壞脾氣，從三十二期倒看上去，不久便翻到第一篇日記文學，也是達夫先生做的，于是便不再去尋方向轉換的途中，變成看談文學了。我這種模模胡胡的看法，自己也明知道是不對的，但怎麼寫的問題，卻就出在那裏面。

作者的意思，大略是說凡文學家的作品，多少總帶點自敘傳的色彩的，若以第三人稱來寫出，則時常有誤成第一人稱的地方。而且敘述這第三人稱的主人公的心理狀態，過于詳細時，讀者會疑心這別人的心思，作者何以會曉得這樣精細？是那一種幻滅之感，就使文學的真實性消失了。所以散文作品中最便當的體裁，是日記體，其次是書簡體。

這誠然也值得討論的。但我想，體裁似乎，不關重要。上文的第一缺點，是讀者的粗心。但只要知道作品大抵是作者借別人以敘自己，或以自己推測別人的東西，便不至于感到幻滅，即使有時不合事實，然而還是真實。其真實，正與用第三人稱時或誤用第一人稱時毫無不同。倘有讀者只執滯于體裁，只求沒有破綻，那就以看新聞記事為宜，對於文藝，

活該幻滅。而其幻滅也不足惜，因為這不是真的幻滅，正如查不出大觀園的遺迹，而不滿意于『紅樓夢』者相同。倘作者如此犧牲了抒寫的自由，即使極小部分，也無異于削足適履的。

第二種缺陷，在中國也已經是頗古的問題。紀曉嵐攻擊蒲留仙的『聊齋志異』就在這一點。兩人密語，決不肯泄，又不爲第三人所聞，作者何從知之？所以他的『閱微草堂筆記』竭力只寫事狀，而避去心思和密語。但有時又落了自設的陷穽，于是只得『春秋左氏傳』的『渾良夫夢中之噪』來解嘲。他的支絀的原因，是在要使讀者信一切所寫爲事實，靠事實來取得真實性，所以一與事實相左，那真實性也隨即滅亡。如果他先意識到這一切是創作，卽是他個人的造作，便自然沒有一切窒礙了。

一般的幻滅的悲哀，我以爲不在假，而在以假爲真。記得年幼時，很喜歡看變戲法，獅騎羊，石子變白鴿，最末是將一個孩子刺死，蓋上被單，一個江北口音的人向觀衆裝出撒錢模樣道：Huazaa Huazaa！大概是誰都知道，孩子並沒有死，噴出來的是裝在刀柄裏的蘇木汁，Huazaa一够，他便會跳起來的。但還是出神地看着，明明意識着這是戲法，

而全心沈浸在這戲法中。萬一變戲法的定要做得真實，買了小棺材，裝進孩子去，哭着擡走，倒反索然無味了。這時候，連戲法的真實也消失了。

我寧看紅樓夢，卻不願看新出的林黛玉日記，牠一頁能够使我不舒服小半天。板橋家書我也不喜歡看，不如讀他的道情。我所不喜歡的是他題了家書兩個字。那麼，爲什麼刻了出來給許多人看的呢？不免有些裝腔。幻滅之來，多不在假中見真，而在真中見假。日記體，書簡體，寫起來也許便當得多罷，但也極容易起幻滅之感；而一起則大抵很厲害，因爲牠起先模樣裝得真。

越縵堂日記近來已極風行了，我看了卻總覺得他每次要留給我一點很不舒服的東西。爲什麼呢？一是鈔上論。大概是受了何焯的故事的影響的，他提防有一天要蒙「御覽」。二是許多墨塗。寫了尙且塗去，該有許多不寫的罷？三是早給人家看，鈔自以爲一部著作了。我覺得從中看不見李慈銘的心，卻時時看到一些做作，彷彿受了欺騙。翻翻一部小說，雖是很荒唐，淺陋，不合理，倒從來不起這樣的感覺的。

聽說後來胡適之先生也在做日記，並且給人傳觀了。照文學進化的理論講起來，一

定該好得多。我希望他提前陸續的印出。

但我想，散文的體裁，其實是大可以隨便的，有破綻也不妨。做作的寫信和日記，恐怕也還不免有破綻，而一有破綻，便破滅到不可收拾了。與其防破綻，不如忘破綻。

在鐘樓上

——夜記之一——

也還是我在廈門的時候，柏生從廣州來，告訴我，愛而君也在那里了。大概是來尋求新的生命的罷，曾經寫了一封長信給K委員，說明自己的過去和將來的志望。

「你知道有一個叫愛而的麼？他寫了一封長信給我，我沒有看完。其實，這種文學家的樣子，寫長信，就是反革命的！」有一天，K委員對柏生說。

又有一天，柏生又告訴了愛而，愛而跳起來道：

「怎麼……怎麼說我是反革命的呢？」

廈門還是和暖的深秋，野石榴開在山中，黃的花——不知道叫什麼名字——開

在樓下，我在用花剛石牆包圍着的樓屋裏聽到這小小的故事，K委員的眉頭打結的正經的臉，愛而的活潑中帶着沈悶的年青的臉，便一齊在眼前出現，又彷彿如見當K委員的眉頭打結的面前，愛而跳了起來，——我不禁從窗隙間望着遠天失笑了。

但同時也記起了蘇俄曾經有名的詩人，『十二個』的作者勃洛克的話來：——

『共產黨不妨礙做詩，但于覺得自己是大作家的事情卻有妨礙。大作家者，是感覺自己一切創作的核心，在自己裏面保持着規律的。』

共產黨和詩，革命和長信，真有這樣地不相容麼？我想。

以上是那時的我想。這時我又想，在這裡有插入幾句聲明的必要：——

我不過說是變革和文藝之不相容，並非在暗示那時的廣州政府是共產政府或委員是共產黨。這些事我一點不知道。只有若干已經『正法』的人們，至今不聽見有人鳴冤或冤鬼訴苦，想來一定是真的共產黨罷。至于有一些，則一時雖然從一方面得了這樣的諛號，但後來兩方相見，杯酒言歡，就明白先前都是誤解，其實是本來可以合作的。

必要已畢，于是放心回到本題。卻說愛而君不久也給了我一封信，通知我已經有了

工作了。信不甚長，大約還有被冤爲「反革命」的餘痛罷。但又發出牢騷來：「給他坐在飯鍋旁邊，無聊得很；二，有一回正在按風琴，一個漠不相識的女郎來送給他一包點心，就弄得他神經過敏，以爲北方女子太死板而南方女子太活潑，不禁「感慨係之矣」了。

關於第一點，我在秋蚊圍攻中所寫的回信中置之不答。夫面前無飯鍋而覺得無聊，覺得苦痛，人之常情也，現在已見飯鍋，還要無聊，則明明是發了革命熱。老實說，遠地方在革命，不相識的人們在革命，我是的確有點高興聽的，然而——沒有法子，索性老實說罷，——如果我的身邊革起命來，或者我所熟識的人去革命，我就沒有這麼高興聽。有人說我應該拚命去革命，我自然不敢不以爲然，但如叫我靜靜地坐下，調給我一杯罐頭牛奶喝，我往往更感激。但是，倘說，你就死心塌地地從飯鍋裏裝飯喫罷，那是不像樣的；然而叫他離開飯鍋去拚命，卻又說不出口，因爲愛而是我的極熟的熟人。于是只好襲用仙傳的古法，裝聾作啞，置之不問不聞之列。只對於第二點加以猛烈的教誡，大致是說他「死板」和「活潑」既然都不贊成，卽等于主張女性應該不死不活，那是萬分不對的。

約略一個多月之後，我抱着和愛而一類的夢，到了廣州，在飯鍋旁邊坐下時，他早已

不在那里了，也許竟並沒有接到我的信。

我住的是中山大學中最中央而最高的處所，通稱「大鐘樓。」一月之後，聽得一個戴瓜皮小帽的祕書說，纔知道這是最優待的住所，非「主任」之流是不准住的。但後來我一搬出，又聽說就給一位辦事員住進去了，莫明其妙。不過當我住在那里的時候，總還是非主任之流即不准住的地方，所以直到知道辦事員搬進去了的那一天爲止，我總是常常又感激，又慚愧。

然而這優待室卻並非容易居住的所在，至少的缺點，是不很能够睡覺的。一到夜間，便有十多匹——也許二十來匹罷，我不能知道確數——老鼠出現，馳騁文壇，什麼都不管。只要可喫的，牠就喫，並且能開盒子蓋，廣州中山大學裏非主任之流即不准住的樓上的老鼠，彷彿也特別聰明似的，我在別地方未曾遇到過。到清晨呢，就有「工友」們大聲唱歌，——我所不懂的歌。

白天來訪的本省的青年，卻大抵懷着非常的好意的。有幾個熱心于改革的，還希望我對於廣州的缺點加以激烈的攻擊。這熱誠很使我感動，但我終于說是還未熟悉本地

的情形，而且已經革命，覺得無甚可以攻擊之處，輕輕地推卻了。那當然要使他們很失望的，過了幾天，尸一君就在新時代上說：——

「……我們中幾個很不以他這句話爲然，我們以爲我們還有許多可罵的地方，我們正想罵罵自己，難道魯迅先生竟看不出我們的缺點麼？……」

其實呢，我的話一半是真的。我何嘗不想了解廣州，批評廣州呢，無奈慨自被供在大鐘樓上以來，工友以我爲教授，學生以我爲先生，廣州人以我爲「外江佬」，孤子特立，無從考查。而最大的阻礙則是言語。直到我離開廣州的時候止，我所知道的言語，除一、二、三、四……等數目外，只有一句凡有外江佬幾乎無不因爲特別而記住的 Hanbaran (統統) 和一句凡有學習異地言語者幾乎無不最容易學得而記住的 罵人話 Tin-na-Tua 而已。

這兩句有時也有用。那是我已經搬在白雲路寓屋裏的時候了，有一天，巡警捉住了一個竊取電燈的偷兒，那管屋的陳公便跟着一面罵，一面打。罵了一大套，而我從中只聽懂了這兩句。然而似乎已經全懂得，心裏想：「他所說的，大約是因爲屋外的電燈幾乎

Hanbaran 被他偷去，所以要 Ti-na-ma 了。』于是就彷彿解決了一件大問題似的，即刻安心歸坐，自去再編我的唐宋傳奇集。

但究竟不知道是否真如此。私自推測是無妨的，倘若據以論廣州，卻未免太鹵莽罷。但雖只這兩句，我卻發見了吾師太炎先生的錯處了。記得先生在日本給我們講文字學時，曾說山海經上『其州在尾上』的『州』是女性生殖器。這古語至今還留在廣東，讀若 Tiu。故 Tinhei 二字，當寫作『州戲』，名詞在前，動詞在後的。我不記得他後來可曾將此說記在新方言裏，但由今觀之，則『州』乃動詞，非名詞也。

至于我說無甚可以攻擊之處的話，那可的確是虛言。其實是那時我于廣州無愛憎，因而也就無欣戚，無褒貶。我抱着夢幻而來，一遇實際，便被從夢境放逐了，不過剩下些沙漠。我覺得廣州究竟是中國的一部分，雖然奇異的花果，特別的語言，可以清亂游子的耳目，但實際是和我所走過的別處都差不多的。倘說中國是一幅畫出的不類人間的圖，則各省的圖樣實無不同，差異的只在所用的顏色。黃河以北的幾省，是黃色和灰色畫的，江浙是淡黑和淡綠，廈門是淡紅和灰色，廣州是深綠和深紅。我那時覺得似乎其實未曾游

行，所以也沒有特別的罵詈之辭，要專一傾注在素馨和香蕉上。——但這也許是後來的回憶的感覺，那時其實是還沒有如此分明的。

到後來，卻有些改變了，往往斗膽說幾句壞話。然而有什麼用呢？在一處演講時，我說廣州的人民並無力量，所以這裡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當譯成廣東話時，我覺得這幾句話似乎被刪掉了。給一處做文章時，我說青天白日旗插遠去，信徒一定加多。但有如大乘佛教一般，待到居士也算佛子的時候，往往戒律蕩然，不知道是佛教的弘通，還是佛教的敗壞……然而終於沒有印出，不知所往了……

廣東的花果，在『外江佬』的眼裏，自然依然是奇特的。我所最愛喫的是『楊桃』，滑而脆，酸而甜，做成罐頭的，完全失卻了本味。汕頭的一種較大，卻是『三廉』，不中喫了。我常常宣傳楊桃的功德，喫的人大抵贊同，這是我這一年中最卓越的成績。

在鐘樓上的第二月，即戴了『教務主任』的紙冠的時候，是忙碌的時期。學校大事，蓋無過于補考與開課也，與別的一切學校同。于是點頭開會，排時間表，發通知書，祕藏題目，分配卷子……于是又開會，討論，計分，發榜。工友規矩，下午五點以後是不做工的，于是

一個事務員請門房幫忙，連夜貼一丈多長的榜。但到第二天的早晨，就被撕掉了，於是又寫榜。於是辯論：分數多寡的辯論；及格與否的辯論；教員有無私心的辯論；優待革命青年優待的程度，我說已優，他說未優的辯論；補救落第，我說權不在我，他說在我，我說無法，他說有法的辯論；試題的難易，我說不難，他說太難的辯論；還有因為有族人在臺灣，自己也可以算作臺灣人，取得優待「被壓迫民族」的特權與否的辯論；還有人本無名，所以無所謂冒名頂替的玄學底辯論……這樣地一天一天的過去，而每夜是十多匹——或二匹——老鼠的馳騁，早上是三位工友的響亮的歌聲。

現在想起那時的辯論來，人是多麼和有限的生命開着玩笑呵。然而那時卻並無怨尤，只有一事覺得頗為變得特別：對於收到的長信漸漸有些讎視了。

這種長信，本是常常收到的，一向並不為奇。但這時竟漸嫌其長，如果看完一張，還未說出本意，便覺得煩厭。有時見熟人在旁，就託付他，請他看後告訴我信中的主旨。

「不錯，「寫長信，就是反革命的！」我一面想。

我當時是否也如工委員似的眉頭打結呢，未曾照鏡，不得而知。僅記得即刻也自覺

到我的開會和辯論的生涯，似乎難以稱爲『在革命』爲自便計，將前判加以修正了：——

「不。」反革命」太重，應該說是「不革命」的。然而還太重。其實是——寫長信，不過是喫得太閑空罷了。」

有人說，文化之興，須有餘裕，據我在鐘樓上的經驗，大致是真的罷。閒人所造的文化，自然只適宜于閒人，近來有些人磨拳擦掌，大鳴不平，正是毫不足怪——其實，便是這鐘樓，也何嘗不造得蹊蹺。但是，四萬萬男女同胞，僑胞，異胞之中，有的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有的是「羣居終日，言不及義」。怎不造出相當的文藝來呢？只說文藝範圍小，容易些。那結論只好是這樣：有餘裕，未必能創作；而要創作，是必須有餘裕的。故「花呀月呀」不出于啼飢號寒者之口，而「一手奠定中國的文壇」亦爲苦工豬仔所不敢望也。

我以爲這一說于我倒是很好的，我已經自覺到自己久已不動筆，但這事卻應該歸罪于匆忙。

大約就在這時候，新時代上又發表了一篇魯迅先生往那裏躲，宋雲彬先生做的文中，有這樣的對于我的警告：——

「他到了中大，不但不會恢復他「吶喊」的勇氣，並且似乎在說「在北方時受着種種迫壓，種種刺激，到這裏來沒有壓迫和刺激，也就無話可說了。」噫！嘻！異哉！魯迅先生竟跑出了現社會，躲向牛角尖裏去了。舊社會死去的苦痛，新社會生出的苦痛，多多少少放在他眼前，他竟熟視無睹！他把人生的鏡子藏起來了，他把自己回復到過去時代去了。噫！嘻！異哉！魯迅先生躲避了。」

而編輯者還很客氣，用案語聲明着這是對於我的好意的希望和慫恿，並非惡意的笑罵的文章。這是很明白的，記得看見時頗為感動。因此也會想如上文所說的那樣，寫一點東西，聲明我雖不吶喊，卻正在辯論和開會，有時一天只喫一頓飯，有時只喫一條魚，也還未失掉了勇氣。『在鐘樓上』就是豫定的題目。然而一則還是因為辯論和開會，二則因為篇首引有拉狄克的兩句話，另外又引起了許多雜亂的感想，很想說出，終於反而攔下了。那兩句話是——

「在一個最大的社會改變的時代，文學家不能做旁觀者！」

但拉狄克的話，是爲了葉遂寧和梭波里的自殺而發的。他那一篇無家可歸的藝術

家譯載在一種期刊上時，曾經使我發生過暫時的思索。我因此知道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詩人，很可有碰死在自己所謳歌希望的現實上的運命；而現實的革命倘不粉碎了這類詩人的幻想或理想，則這革命也還是布告上的空談。但葉遂寧和梭波里是未可厚非的，他們先後給自己唱了輓歌，他們有真實。他們以自己的沈沒，證明着革命的前行。他們到底並不是旁觀者。

但我初到廣州的時候，有時確也感到一點小康。前幾年在北方，常常看見迫壓黨人看見捕殺青年，到那里可都看不見了。後來纔悟到這不過是「奉旨革命」的現象，然而在夢中時是委實有些舒服的。假使我早做了「在鐘樓上」文字也許不如此。無奈已經到了現在，又經過目覩「打倒反革命」的事實，純然的那時的心情，實在無從追臨了。現在就只好是這樣罷。

辭顧頡剛教授令「候審」

來信

魯迅先生：

頃發一掛號信，以未悉先生住址，由中山大學轉奉，嗣恐先生未能接到，特探得尊寓所在，另鈔一分奉覽。

敬請大安。

顧剛敬上。

十六，七，廿四。

鈔件

魯迅先生：

頤剛不知以何事開罪於先生，使先生對於頤剛竟作如此強烈之攻擊，未即承教，良用耿耿。前日見漢口中央日報副刊上，先生及謝玉生先生通信，始悉先生等所以反對頤剛者，蓋欲伸黨國大義，而頤剛所作之罪惡直爲天地所不容，無任惶駭。誠恐此中是非，非筆墨口舌所可明了，擬於九月中回粵後提起訴訟，聽候法律解決。如頤剛確有反革命之事實，雖受死刑，亦所甘心，否則先生等自當負發言之責任。務請先生及謝先生暫勿離粵，以俟開審，不勝感盼。

敬請大安，謝先生處並候。

中華民國十六年七月廿四日

回 信

頤剛先生：

來函謹悉，甚至於嚇得絕倒矣。先生在杭蓋已聞僕于八月中須離廣州之訊，于是頓生妙計，命以難題。如命，則僕尙須提空囊賃屋買米，作窮打算，恭候偏何來遲，提起訴訟。不

如命，則先生可指我爲畏罪而逃也；而況加以照例之一傳十，十傳百乎哉？但我意早決，八月中仍當行，九月已在滬。江浙俱屬黨國所治，法律當與粵不異，且先生尙未啓行，無須特別函挽聽審，良不如請卽就近在浙起訴，爾時僕必到杭，以負應負之責。倘其典書賣穢，居此生活費綦昂之廣州，以俟月餘後或將提起之訴訟，天下那易有如此十足笨伯哉！中央日報副刊未見；謝君處恕不代達，此種小傀儡，可不作則不做而已，無他祕計也。此復，順請著安！

魯迅。

匪筆三篇

今之「正人君子」論事有時喜歡講「動機。」案動機，我自己知道，紹介這三篇文章是未免有些有傷忠厚的。旅資將盡，非逐食不可了，許多人已知知道我將于八月中走出廣州。八月末就收到了一封所謂「學者」的信，說我的文字得罪了他，「擬於九月中回粵後提起訴訟，聽候法律解決。」且叫我「暫勿離粵，以俟開審。」命令被告榜腹恭候于異地，以俟自己雍容布置，慢慢開審，真是霸道得可觀。第二天偶在報紙上看見飛天虎寄亞妙信，有「提防劍仔」的話，不知怎地忽而欣然獨笑，還想到別的兩篇東西，要執紹介之勞了。這種拉扯牽連，若即若離的思想，自己也覺得近乎刻薄——但是，由牠去罷，好在「開審」時總會結帳的。

在我的估計上，這類文章的價值卻並不在文人學者的名文之下。先前也曾收集，得了五六篇，後來只在北京的『平民週刊』上發表過一篇模範監獄裏的一個囚人的自序，其餘的呢，我跑出北京以後，不知怎樣了，現在卻還想搜集。要誇大地說起來，則此類文章，于學術上也未始無用；我記得Lombroso所做的一本書——大約是『天才與狂人』，請讀者恕我手頭無書，不能指實——後面就附有許多瘋子的作品。然而這種金字招牌，我輩卻無須掛起來。

這回姑且將現成的三篇介紹，都是從香港『循環日報』上採取的，以其都不是諧文，所以取阮氏『文筆對』之說，名之曰筆。倘有好事之徒，寄我材料，無任歡迎。但此後擬不限有韻無韻，並且廓大範圍，並收土匪、騙子、犯人、瘋子等等的創作。但經文人潤色，或擬作贗作者不收。

其實，古如陳涉帛書，米巫題字，近如義和團傳單，同善社亂筆，也都是這一流。我想，凡見于古書的，也都可以抄出來編為一集，和現在的來比照，看思想手段，有什麼不同。

來件想托北新書局代收，當擇尤發表——但這是我倘不忙于『以俟開審』或下

了牢監的話。否則，自己的文章也就是材料，不必旁搜博采了。

閑話休題，言歸正傳——

一 撕票佈告

解 平

廣州佛山缸瓦欄維新碼頭發現爛艇一艘，有水浸淹其中，用簑衣覆蓋男子屍身一具，露出手足，旁有粗碗一隻，白旗一面，書明云云。由六區水警，將該屍艇移泊西醫院附近。驗得該屍頸旁有一鎗孔，直貫其鼻，顯係生前轟斃。查死者年約三十歲，乃穿短線衫褲，剪平頭裝者。

南海紫洞潘平佈告

爲佈告事：昨四月念六日，在祿步共擄得鄉人十餘名，困留月餘，并望贖音。茲提出祿步笪洞沙鄉，姓許名進洪一名，槍斃示衆，以儆其餘。四方君子，特字週知，切勿視財如命。此佈。

（據七月十三日循環報）

二 致信女某書

金吊桶

廣西梧州洞天酒店相命家金吊桶，原名黃卓生，新會人，日前有行騙陳社恩、黃心、黃作樑夫婦銀錢單據，爲警備司令部將其捕獲，又搜獲一封固之信，內空白信箋一張，以火烘之，發現字迹如下：——

今日民國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呂純陽先師下降，查明汝信女係廣西人。汝今生爲人，心善清潔，今天上玉皇賜橫財四千五百兩銀過你，汝信享福養兒育女。但此財分作八回中足，今年七月尾只中白鴿票七百五十元左右。老來結局有個子，第三位有官星發達，有官太做。但汝終身要派大三房妾伴，不能坐正位。今生條命極好。汝前世犯了白虎五鬼天狗星，若想得橫財旺子，要用六元六毫交與金吊桶先生代汝解除，方得平安無事。若不信解除，汝條命得來十分無夫福無子福，有子死子，有夫死夫。但見字要求先生共汝解去此凶星爲要可也。汝想得財得子者，爲夫福者，有夫權者，要求先生共汝行禮，交合陰陽一二回，方可平安。如有不順從先生者，汝條命冇好處，無安樂也……

(據七月二十六日循環報)

三 詰妙婦書

蕭天虎

香港永樂街如意茶樓女招待妙婦，年僅雙十，寓永吉街三十號二樓。七月二十九日晚十一時許，散工之後，偕同女侍三數人歸家，道經大道中永吉街口，遇大漢三四人，要截於途，詰妙婦曰：汝其爲妙玲乎？婦不敢答，閃避而行。詎大漢不使去，逞兇毆之，凡兩拳，且曰：汝雖不語，固認識汝之面目者也！婦被毆，大哭不已，歸家後，以爲大漢等所毆者爲妙玲，故尙自怨無辜被辱，不料翌早復接恐嚇信一通，按址由郵局投至，遂知昨晚之被毆，確爲尋己，乃將事密報偵探，並告以所疑之人，務使就捕雪恨云。

亞妙女招待看啓者：久在如意茶樓，用諸多好言，毆辱我兄弟，及用滾水來陸之兄弟，靈端相勸，置之不理，與續大發雌雄，反口相齒，亦所謂惡不甚言矣。昨晚在此二人毆打已搥，亦非介意，不過小小之用。刻下限期一星期內答覆，妥講此事，若有無答覆，早夜出入，提防劍

仔，決列對待，及難保性命之虞，勿怪書不在先，至於死地之險也。諸多未及，難解了言順候，此詢危險。七月初一晚，卅六友飛天虎謹。

（據八月一日循環報）

某筆兩篇

昨天又得幸逢了兩種奇特的廣告，仍敢執紹介之勞。標點是我所加的，以醒眉目。該稱什麼筆呢，想了兩天兩夜，沒有好結果。姑且稱爲「某筆」，以俟博雅君子教正。

這回的「動機」比較地近於純正，除希望「有目共賞」外，似乎並不含有其他的副作用了。但又發生了一種妄想。記得前清時，曾有一種專選各種報上較好的論說的，叫作「選報」。現在如有好事之徒，也還可以辦這一類的刊物。每省須有訪員數人，專收該地報上奇特的社論，記事，文藝，廣告等等，彙刊成冊，公之於世。則其顯示各種「社會相」也，一定比游記之類要深切得多。不知 C

「男士以爲何如？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午飯之前。」

其一

熊仲卿

榜名文蔚。歷任民國縣長、所長、處長、局長、廳長、通儒、顯宦，兼作良醫，尤擅女科。

住本港跑馬地黃泥涌道門牌五十五號一樓中醫熊寓，每日下午應診及出診。電話總局五二七零。

（右一則見九月二十一日香港循環日報。）

謹案：以吾所聞，向來或稱世醫，以其數代爲醫也；或稱儒醫，以其曾做八股也；或稱官醫，以其亦爲官家所僱也；或稱御醫，以其曾經走進（？）太醫院也。若夫「縣長、所長、處長、局長、廳長、通儒、顯宦」而又「兼作良醫」，則誠曠古未有者矣。而五「長」做全，尤爲難得云。

其二

徵求父母廣告 余現已授中等教育有年，品行端正，純無嗜好。因不幸父母相繼逝世，余獨取家資，來學廣州。自思自覺單身兒子，有非常之寂寞。於是自願甘心爲人兒子。并自願傾家產而從四方人事，而無兒子者。有相當之家庭，且欲兒子者，請來函報告（家庭狀況經濟地位若何），并寫明通訊地址。俟我回覆，方接洽面商。閱報諸君而能介紹我好事成功者，應以百金敬酬。不成功者，當有謝謝。申一〇六

通訊處

廣東省立第一中學校余希成具。

（右一則見同日廣州民國日報）

謹案：我輩生當澆濟之世，於「徵求伴侶」等類廣告，早經司空見慣，不以爲奇。昔讀茅泮林所輯「古孝子傳」，見有三男皆無母，乃共迎養一不相干之老嫗，當作母親一事，頗以爲奇。然那時孝廉方正，可以做官，故尙能疑爲別有作用也。而此廣告則挾家資以求親，懸百金而待薦，雜誦之餘，烏能不欣人心之復返於淳古，表而出之，以爲留心世道者告，而爲打爹罵娘者勸哉？特未知閱報諸君，可知廣州有欲兒子者否？要知道倘爲介紹，即使好事不成，亦有「謝謝」者也。

述香港恭祝聖誕

記者先生：

文宣王大成至聖先師孔子聖誕，香港恭祝，向稱極盛。蓋北方僅得東鄰鼓吹，此地則有港督督率，實事求是，教導有方。僑胞亦知崇拜本國至聖，保存東方文明，故能發揚光大，盛極一時也。今年聖誕，尤為熱鬧，文人雅士，則在陶園雅集，即席揮毫，表示國粹。各學校皆行祝聖禮，往往歡迎各界參觀，夜間或演新劇，或演電影，以助聖興。超然學校每年祝聖，例有新式對聯，貼於門口，而今年所製，尤為高超。今敬謹錄呈，乞昭示內地，以愧意欲打倒

帝國主義者——

韓 男校門聯

本魯史，作春秋，罪齊田恆，地義天經，打倒賊子亂臣，免得赤化宣傳，討
產公妻，破壞綱常倫紀。

墮三都，出藏甲，誅少正卯，風行雷厲，剷除貪官悍吏，訓練青年德育，修身齊家，愛
親敬長，挽回世道人心。

坤 女校門聯

母憑子貴，妻藉夫榮，方今祝聖誠心，正宜遵懷三從，豈可開口自由，埋口自由，一
味誤會自由，趨附潮流，成水性。

男稟乾剛，女占坤順，此際尊孔主義，切勿反違四德，動說有乜所謂，有乜所謂，至
則不知所謂，隨同社會出風頭。

埋猶言合，乜猶言何，有猶言無，蓋女子小人，不知雅訓，故用俗字耳。輿論之類，琳琅尤多，今
僅將載于循環日報者錄出一篇，以見大概：——

孔誕祝聖言感

佩 著

金風送爽。涼露驚秋。轉瞬而孔誕時期屆矣。邇來聖教衰落。邪說囂張。禮孔之舉。惟港中人士。猶相沿奉行。至若內地。大多數不甚注意。蓋自新學說出。而舊道德日卽於淪亡。自新人物出。而古聖賢胥歸於淘汰。一般學子。崇持列寧馬克斯種種謬說。不惜舉二千年來炳若日星之聖教。摧陷而廓清之。其詆人也。不曰腐化卽曰老朽。實則若曹少不更事。鹵莽滅裂。不惜假新學說。以便其私圖。而古人之大義微言。儼如肉中刺。眼中釘。必欲拔除之。而後快。孔子且在於打倒之列。更有孔誕之可言。嗚呼。長此以往。勢不至等人道於禽獸不止。何幸此海隅之地。古風未泯。經教猶存。當此祝聖時期。濟濟跼跼。一時稱盛耶。雖然。吾人祝聖。特爲此形式上之紀念耳。尤當注重孔教之精神。孔教重倫理。重實行。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由近及遠。由內及外。皆有軌道之可循。天不變道亦不變。自有磅礴之理由在。雖暴民囂張。摧殘聖教。然浮雲之翳。何傷日月之明。吾人當蒙泉剝果之餘。傷今思古。首當發揮大義。羽翼微言。子輿氏謂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生今之世。羣言淆亂。異說爭鳴。衆口鑠金。積非成是。與聖教爲難者。向祇楊墨。就貴詞而

闢之爲吾道作干城。樹中流之砥柱。若乎張皇耳目。塗飾儀文。以敷衍爲心。作例行之舉。則非吾所望於祝聖諸公也。感而書之如此。

香港孔聖會則于是日在太平戲院日夜演大堯天班。其廣告云：——

祝大成之聖節，樂奏鈞天，彰正教於人羣，歡騰大地。我國數千年來，崇奉孔教，誠以聖道足以維持風化，挽救人心者也。本會定期本月廿七日演大堯天班。是日演加官大送子、遊龍戲鳳。夜通宵先演六國大封相及風流皇后新劇。查風流皇后一劇，情節新奇，結構巧妙。惟此劇非演通宵，不能結局，故是晚經港政府給發數特別執照。演至通宵……預日沽票處在荷李活道中華書院孔聖會辦事所。

丁卯年八月廿四日，

香港孔聖會謹啓。

風流皇后之名，雖欠雅馴，然「子見南子」論語不諱，惟此「海隅之地，古風未泯」者，能知此意耳。餘如各種電影，亦復美不勝收，新戲院則演「濟公傳四集」預告者尙有「齊天大聖大鬧天宮」新世界有「武松殺嫂」全係國粹，足以發揚國光。皇后戲院之「假

面新娘」雖出鄰邦，然觀其廣告云：「孔子有言，「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改是。」請君今日來看「假面新娘」以證孔子之言。然後知聖人一言而爲天下法，所以不愧稱爲萬世師表也。」則固亦有裨聖教者耳。嗟夫！乘桴浮海，曾聞至聖之微言，崇正闢邪，幸有大英之德政。愛國劬古之士，當亦必額手遙慶，恨不得受一塵而爲氓也。專此布達，卽頌

輯祺。

聖誕後一日，華約瑟謹啓。

弔與賀

語絲在北京被禁之後，一個相識者寄給我一塊剪下的報章，是十一月八日的北京民國晚報的華燈欄，內容是這樣的：——

弔喪文

孔骨尾

頃聞友云：「語絲已停，」其果然歟？查語絲問世，三年於斯，素無餘潤，常經風波。以久特闢，迄未少衰焉。方期益臻堅壯，豈意中道而崩？「閑話」失慎，「隨感」傷風，歟？抑有他故耶？豈明老人再不與風作浪，叛徒首領無從發令施威；忠臣孝子，或可少申餘憤；義士仁人，大宜下井投石。「語絲派」已亡，衆恐少息，「擁旗」

黨」猶在，五色何憂？從此狂瀾平靜，邪說殲絕。有關風化，良匪淺鮮，則語絲之停也，豈不懿歟？所惜者餘孽未盡，禍根猶存，復萌故態，誠堪預防！自宜除惡務盡，何容姑息養奸？與仁義師，招撫並用；設文字獄，賞罰分明。打倒異端，懲辦禍首；以安民心，而屬衆望。豈惟功垂不朽，曷止德及黎庶？抑亦國旗爲榮耶？效狂瀾之往例，草語絲之哀辭，當仁不讓，舍我其誰？朝鮮君子，乞勿忽之。

未廢標點，已禁語體之秋，陽歷晦日，杏壇上。

先前沒有想到，這回卻記得起來了。去年我在廈門島上時，也有一個朋友剪寄我一片報章，是北京的每日評論，日子是「丙寅年十二月二十……」陽歷的日子被剪掉了。內容是這一篇——

就狂瀾

畫 生

不料我剛作了讀狂瀾一文之後，狂瀾疾終於上海正寢的訃聞隨着就送到了。本來狂瀾的不會長命百歲，是我們早已料到的，但牠夭折的這樣快，卻確乎

「出人意表之外。」尤其是當這與「思想界的權威者」正在宣戰的時候，而突然得到如此的結果，多心的人也許會猜疑到權威者的反攻戰略上面，「這話當然不確，」「不過」自由批評家所走不到的光華書局，「思想界的權威」也許竟能走得到了，於是乎狂飄乃停，於是乎狂飄乃不得不停。

但當今之世，權威亦多矣，狂飄所得罪者不知是南方之強歟？北方之強歟？抑……歟？

思想家究竟不如武人爽快，狂飄雖停，而長虹終於能安然走到北京，這個，我們倒要向長虹道賀。

嗚呼！回想非宗教大同盟轟轟烈烈之際，則有五教授慨然署名於擁護思想自由之宣言，會幾何時，而自由批評已成爲反動者唯一之口號矣。自由乎！自由乎！其隨線裝書以入於毛廁坑中乎！嘻嘻！咄咄！

語絲本來並非選定了幾個人，加以恭維或攻擊或詛咒之後，便將作者和刊物的榮枯存滅，都推在這幾個人的身上的出版物。但這回的禁終于燕京北寢的計聞，卻「也

許』不『會猜疑到權威者的反攻戰略上面』去了罷。誠然，我亦覺得『思想家究竟不如武人爽快』也！

但是，這個，我倒要向燕生和五色國旗道賀。

十二月四日，於上海正寢。

一九二八年

「醉眼」中的朦朧

舊曆和新曆的今年似乎于上海的文藝家們特別有着刺激力，接連的兩個新正一過，期刊便紛紛而出了。他們大抵將全力用盡在偉大或尊嚴的名目上，不惜將內容壓殺，連產生了不止一年的刊物，也顯出拚命的掙扎和突變來。作者呢，有幾個是初見的名字，有許多卻還是看熟的，雖然有時覺得有些生疏，但那是因為停筆了一年半載的緣故。他們先前在做什麼，為什麼今年一齊動筆了？說起來怕話長。要而言之，就因為先前可以不動筆，現在卻只好來動筆，仍如舊日的無聊的文人，文人的無聊一模一樣。這是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大家都有些自覺的，所以總要向讀者聲明「將來」不是「出國」，「進研究室」便是「取得民衆」。功業不在目前，一旦回國，出室，得民之後，那可是非同小可了。自

然，倘有遠識的人，小心的人，怕事的人，投機的人，最好是此刻豫致「革命的敬禮。」一到將來，就要「悔之晚矣」了。

然而各種刊物，無論措辭怎樣不同，都有一個共通之點，就是有些朦朧。這朦朧的發祥地，由我看來——雖然是馮乃超的所謂「醉眼陶然」——也還在那有人愛，也有人憎的官僚和軍閥。和他們已有瓜葛，或想有瓜葛的，筆下便往往笑迷迷，向大家表示和氣，然而有遠見，夢中又害怕鐵鎚和鐮刀，因此也不敢分明恭維現在的主子，于是在這裏留着一點朦朧。和他們瓜葛已斷，或則並無瓜葛，走向大衆去的，本可以毫無顧忌地說話了，但筆下即使雄糾糾，對大家顯英雄，會忘卻了他們的指揮刀的傻子是究竟不多的，這也就留着一點朦朧。于是想要朦朧而終於透漏色彩的，想顯色彩而終於不免朦朧的，便都在同地同時出現了。

其實朦朧也不關怎樣緊要。便在最革命的國度裏，文藝方面也何嘗不帶些朦朧。然而革命者決不怕批判自己，他知道得很清楚，他們敢于明言。惟有中國特別，知道跟着人稱託爾斯泰爲「卑汙的說教人」了，而對於中國「目前的情狀」卻只覺得在「事實

上，社會各方面亦正受着烏雲密布的勢力的支配，『連他的『剝去政府的暴力，裁判行政的喜劇的假面』的勇氣的幾分之一也沒有；知道人道主義不澈底了，但當『殺人如草不聞聲』的時候，連人道主義式的抗爭也沒有。剝去和抗爭，也不過是『咬文嚼字』並非『直接行動』。』我並不希望做文章的人去直接行動，我知道做文章的人是大概只能做文章的。

可惜略遲了一點，創造社前年招股本，去年請律師，今年纔揭起『革命文學』的旗子，復活的批評家成仿吾總算離開守護『藝術之宮』的職掌，要去『獲得大眾』並且給革命文學家『保障最後的勝利』了。這飛躍也可以說是必然的。弄文藝的人們大抵敏感，時時也感到，而且防着自己的沒落，如漂浮在大海裏一般，拚命向各處抓攬。二十世紀以來的表現主義，踏踏主義，什麼什麼主義的此興彼衰，便是這透露的消息。現在則已是大時代，動搖的時代，轉換的時代，中國以外，階級的對立大抵已經十分銳利化，農工大衆日日顯得着重，倘要將自己從沒落救出，當然應該向他們去了。何況『嗚呼！小資產階級原有兩個靈魂……』雖然也可以向資產階級去，但也能够向無產階級去的呢。

這類事情，中國還在萌芽，所以見得新奇，須做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那樣的大題目，但在工業發達，貧富懸隔的國度裏，卻已是平常的事情。或者因為看準了將來的天下，是勞動者的天下，跑過去了；或者因為倘幫強者，寧幫弱者，跑過去了；或者兩樣都有，錯綜地作用着，跑過去了。也可以說，或者因為恐怖，或者因為良心。成仿吾教人克服小資產階級根性，拉「大眾」來作「給與」和「維持」的材料，文章完了，卻正留下一個不小的問題——

倘若難于「保障最後的勝利，」你去不去呢？

這實在還不如在成仿吾的祝賀之下，也從今年產生的文化批判上的李初梨的文章，索性主張無產階級文學，但無須無產者自己來寫；無論出身是什麼階級，無論所處是什麼環境，只要「以無產階級的意識，產生出來的一種的鬪爭的文學」就是，直截爽快得多了。但他一看見「以趣味為中心」的可惡的「語絲派」的人名就不免曲折，仍舊「要問甘人君，魯迅是第幾階級的人？」

我的階級已由成仿吾判定：「他們所矜持的是「閒暇，閒暇，第三個閒暇。」他們是

代表着有閒的資產階級，或者睡在鼓裏的小資產階級……如果北京的烏煙瘴氣不用十萬兩無煙火藥炸開的時候，他們也許永遠這樣過活的罷。」

我們的批判者纔將創造社的功業寫出，加以「否定的否定」要去「獲得大眾」的時候，便已夢想「十萬兩無煙火藥」並且似乎要將我擠進「資產階級」去（因為「有閒就是有錢」云）我倒頗也覺得危險了。後來看見李初梨說：「我以為一個作家，不管他是第一、第二……第百第千階級的人，他都可以參加無產階級文學運動；不過我們先要審察他們的動機……」這纔有些放心，但可慮的是對於我仍然要問階級。「有閒便是有錢」倘使無錢，該是第四階級，可以「參加無產階級文學運動」了罷，但我知道那時又要問「動機」。總之，最要緊是「獲得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這回可不能只是「獲得大眾」便算完事了。橫豎纏不清，最好還是讓李初梨去「由藝術的武器到武器的藝術」讓成仿吾去坐在半租界裏積蓄「十萬兩無煙火藥」我自己是照舊講「趣味」。

成仿吾的「閒暇，閒暇，第三個閒暇」的切齒之聲，在我是覺得有趣的。因為我記

得曾有人批評我的小說，說是『第一個是冷靜，第二個是冷靜，第三個還是冷靜』，『冷靜』並不算好批判，但不知怎地竟像一板斧劈着了這位革命的批評家的記憶中樞似的，從此『閒暇』也有三個了。倘有四個，連『小說舊聞鈔』也不寫，或者只有兩個，見得比較地忙，也許可以不至于被『奧伏赫變』（『除掉』的意思，Aufheben 的創造派的譯音，但我不解何以要譯得這麼難寫，在第四階級，一定比照描一個原文難罷，所可惜的是偏偏是三個。但先前所定的不『努力表現自己』之罪，大約總該也和成仿吾的『否定的否定』一同勾消了。

創造派『為革命而文學』所以仍舊要文學，文學是現在最緊要的一點，因為將『由藝術的武器，到武器的藝術』一到『武器的藝術』的時候，便正如『由批判的武器，到用武器的批判』的時候一般，世界上有先例，『徘徊者變成同意者，反對者變成徘徊者』了。但即刻又有一點不小的問題：為什麼不就到『武器的藝術』呢？

這也很像『有產者差來的蘇秦的游說』。但當現在『無產者未曾從有產者意識解放以前』，這問題是總須起來的，不盡是資產階級的退兵或反攻的毒計。因為這極激

底而勇猛的主張，同時即含有可疑的萌芽了。那解答只好是這樣——

因為那邊正有「武器的藝術」，所以這邊只能「藝術的武器。」

這藝術的武器，實在不過是不得已，是從無抵抗的幻影脫出，墜入紙戰鬥的新夢裏去了。但革命的藝術家，也只能以此維持自己的勇氣，他只能這樣。倘他犧牲了他的藝術，去使理論成爲事實，就要怕不成其爲革命的藝術家。因此必然的應該坐在無產階級的陣營中，等待「武器的鐵和火」出現。這出現之際，同時拿出「武器的藝術」來。倘那時鐵和火的革命者已有一個「閒暇」能靜聽他們自敘的功勳，那也就成爲一樣的戰士了。最後的勝利。然而文藝是還是批判不清的，因爲社會有許多層，有先進國的史實在；要取目前的例，則文化批判已經拖住 Upton Sinclair，創造月刊也背了 Vigny 在「開步走」了。

倘使那時不說「不革命便是反革命」革命的遲滯是語絲派之所爲，給人家掃地也還可以得到半塊麵包喫，我便將于八時間工作之暇，坐在黑房裏續鈔我的小說舊聞鈔，有幾國的文藝也還是要談的，因爲我喜歡。所怕的只是成仿吾們真像符拉特彌爾。

伊力支一般，居然「獲得大衆」那麼，他們大約更要飛躍又飛躍，連我也會陞到貴族或皇帝階級裏，至少也總得充軍到北極圈內去了譯著的書都禁止，自然不待言。

不遠總有一個大時代要到來。現在創造派的革命文學家和無產階級作家雖然不得已而玩着『藝術的武器』，而有『武器的藝術』的非革命武學家也玩起這玩意兒來了，有幾種笑迷迷的期刊便是這。他們自己也不大相信手裏的『武器的藝術』了罷。那麼，這一種最高的藝術——『武器的藝術』現在究竟落在誰的手裏了呢？只要尋得到，便知道中國的最近的將來。

(二月二十三日，上海)

看司徒喬君的畫

我知道司徒喬君的姓名還在四五年前，那時是在北京，知道他不管功課，不尋導師，以他自己的力，終日在畫古廟，土山，破屋，窮人，乞丐……。

這些自然應該最會打動南來的游子的心。在黃埃漫天的人間，一切都成土色，人于和天然爭鬪，深紅和紺碧的棟宇，白石的欄干，金的佛象，肥厚的棉襖，紫糖色臉，深而多的臉上的皺紋……凡這些，都在表示人們對於天然並不降服，還在爭鬪。

在北京的展覽會裏，我已經見過作者表示了中國人的這樣的對於天然的倔強的魂靈。我曾經得到他的一幅『四個警察和一個女人』。現在還記得一幅『耶穌基督』，有一個女性的口，在他荆冠上接吻。

這回在上海相見，我便提出質問——

「那女性是誰？」

「天使，」他回答說。

這回答不能使我滿足。

因為這回我發見了作者對於北方的景物——人們和天然苦鬪而成的景物——又加以爭鬪，他有時將他自己所固有的明麗，照破黃埃。至少，是使我覺得有「歡喜」（Joy）的萌芽，如脅下的牙傷，儘管流血，而荆冠上卻有天使——照他自己所說——的嘴唇。無論如何，這是勝利。

後來所作的爽朗的江浙風景，熱烈的廣東風景，倒是作者的本色。和北方風景相對照，可以知道他揮寫之際，蓋諗熟而高興，如逢久別故人。但我卻愛看黃埃，因為由此可見這抱着明麗之心的作者，怎樣爲人和天然的苦鬪的古戰場所驚，而自己也參加了戰鬪。

中國全土必須溝通。倘將來不至于割據，則青年的背着歷史而竭力去拂黃埃的中

看司徒喬的畫

國彩色，我想，首先是這樣的。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四日夜，于上海。)

在上海的魯迅啓事

大約一個多月以前，從開明書店轉到M女士的一封信，其中有云——

「自一月十日在杭州孤山別後，多久沒有見面了。前蒙允時常通訊及指導……。」

我便寫了一封回信，說明我不到杭州，已將十年，決不能在孤山和人作別，所以她所看見的，是另一人。兩禮拜前，蒙M女士和兩位曾經聽過我的講義的同學見訪，三面證明，知道在孤山者，確是別一「魯迅。」但M女士又給我看題在曼殊師墳旁的四句詩——

「我來君寂居，

喚醒誰氏魂？

飄萍山林跡，

待到它年隨公去。

魯迅遊杭

弔老友

曼殊句

一，一〇，十七年。」

我于是寫信去打聽寓杭的江君，前天得到回信，說確有人見過這樣的一個人，就在城外教書，自說姓周，會做一本『彷徨』，銷了八萬部，但自己不滿意，不遠將有更好的東西發表云云。

中國另有一個本姓周或不姓周，而要姓周，也名魯迅，我是毫沒法子的。但看他自敘，有大半和我一樣，卻有些使我爲難。那首詩的不大高明，不必說了，而硬替人向曼殊說『待到它年隨公去』也未免太專制。『去』呢，自然總有一天要『去』的，然而去『隨』曼殊，卻連我自己也夢裏都沒有想到過。但這還是小事情，尤其不敢當的，倒是什麼對別人豫約『指導』之類……。

我自到上海以來，雖有幾種報上說我『要開書店』或『游了杭州』其實我是書店也沒有開，杭州也沒有去，不過仍舊躲在樓上譯一點書。因爲我不會拉車，也沒有學製無煙火藥，所以只好這樣用筆來混飯喫。因爲這樣在混飯喫，于是忽被推爲『前驅』，忽

被擠爲『落伍』，那還可以說是自作自受，管他娘的去。但若再有一個『魯迅』，替我說教，代我題詩，而結果還要我一個人來擔負，那可真不能『有閑，有閑，第三個有閑』，連譯書的工夫也要沒有了。

所以這回再登一個啓事。要聲明的是：我之外，今年至少另外還有一個叫『魯迅』的在，但那些個『魯迅』的言動，和我也曾印過一本『彷徨』而沒有銷到八萬本的魯迅無干。

（三月二十七日，在上海。）

文藝與革命

來信

魯迅先生：

在新聞報的學海欄內，讀到你底一篇文學和政治的歧途的講演，解釋文學者和政治者之背離不合，其原因在政治者以得到目前的安寧爲滿足，這滿足，在感覺銳敏的文學者看去，一樣是胡塗不澈底，表示失望。終于遭政治家之忌，潦倒一生，站不住腳。我覺得這是世界各國成爲定例的事實。最近又在語絲上讀到民衆主義和天才和你底「醉眼」中的朦朧兩篇文章，確實提醒了此刻現在做着似是而非的平凡主義和革命文學的迷夢的人們之朦朧不少，至少在我是這樣。

我相信文藝思潮無論變到怎樣，而藝術本身有無限的價值等級存在，這是不得不否認的。這是說，文藝之流，從最初的什麼主義到現在的什麼主義，所寫着的內容，如何不同，而要有精刻熟練的才技，造成一篇優美無媲的文藝作品，終是一樣。一條長江，上流和下流所呈現的形相，雖然不同，而長江還是一條長江。我們看它那下流的廣大深緩，足以灌田畝，駛巨舶，便忘記了給它形成這廣大深緩的來源，已覺糊塗到透頂。若再斷章取義，說：此刻現在，我們所要的是長江的下流，因為可以利用，增加我們的財富，上流的長江可以不要，有着簡直無用。這是完全以經濟價值去評斷長江本身整個的價值了。這種評斷，出于着眼在經濟價值的商人之口，不足為怪；出于着眼在藝術價值的文藝家之口，未免昏亂至于無可救藥了。因為拿藝術價值去評斷長江之流，未始沒有意義，或竟比之下流較為自然奇偉，也未可知。

真與美是構成一件成功的藝術品的兩大要素。而構成這真與美至于最高等級，便是造成一件藝術品，使它含有最高級的藝術價值，那便非賴最高級的天才不可了。如果這個論斷可以否認，那末我們為什麼稱頌荷馬、但丁、沙士比亞和歌德呢？我們為什麼不

能創造和他們同等的文藝作品呢，我們也有觀察現象的眼，有運用文思的腦，有握管伸紙的手？

在現在，離開人生說藝術，固然有躲在象牙塔裏忘記時代之嫌；而離開藝術說人生，那便是政治家和社會運動家的本相，他們無須談藝術了。由此說，熱心革命的人，儘可投入革命的羣衆裏去，衝鋒也好，做後方的工作也好，何必拿文藝作那既穩當又革命的勾當？

我覺得許多提倡革命文學的所謂革命文藝家，也許是把表現人生這句話誤解了。他們也許以為十九世紀以來的文藝，所表現的都是現實的人生，在那裏面，含有顯著的時代精神。文藝家自驚醒了所謂「象牙之塔」的夢以後，都應該跟着時代環境奔走；離開時代而創造文藝，便是獨善主義或貴族主義的文藝了。他們看到易卜生之偉大，看到陀斯妥以夫斯基的深刻，尤其看到俄國革命時期內的作家葉遂寧和戈理奇們的熱切動人，便以為現在此後的文藝家都須拿當時的生活現象來詛咒，刻劃，予社會以改造革命的機會，使文藝變為民衆的和革命的文藝。生在所謂「世紀末」的現代社會裏面的

人，除非是神經麻木了的，未始不會感到苦悶和悲哀。文藝家終比一般人感覺銳敏一點。擺在他們眼前的既是這麼一個社會，蘊在他們心中的當有怎麼一種情緒呢！他們有表現或刻劃的才技，他們便要如實地寫了出來，便無意地成爲這時代的社會的呼聲了。然而他們還是忠于自己，忠于自己的藝術，忠于自己的情知。易卜生被稱頌爲改革社會的先驅，陀思妥以夫斯基被稱爲人道主義的極致者，還須賴他們自己特有的精妙的才技，經幾個真知灼見的批評者爲之闡揚而後可。然而，真能懂得他們的藝術的，究竟還是少數。至于葉遂寧是碰死在自己的希望碑上不必說了，戈理基呢，聽人說，已有點灰色了。這且不說。便是以藝術本身而論，他何常不崇尚真切精到的才技？我曾看到他的一首譏笑那不切實的詩人的詩。況且我們以藝術價值去衡量他的作品，是否他已是了不得的作家了，究竟還是疑問呵。

實在說，文藝家是不會拋棄社會的，他們是站在民衆裏面的。有一位否認有條件的文藝批評者，對於泰奴 (Taine) 的時間條件，認爲不確，其理由是：文藝家是看前五十年。我想，看前五十年的文藝家，還是站在那時候，以那時候做的生活環境地盤而出發，所以

他畢竟是那時候的民衆之一員，而能在朦朧平安中看出殘缺和破敗。他們便以熟練的才技，寫出這種殘缺和破敗，于藝術上達到高級的價值爲止，在他們自己的能力範圍之內。在創造時，他們也許只顧到藝術的精細微妙，並沒想到如何激動民衆，予民衆以強烈的刺激，使他們血脈憤張，而從事于革命。

我們如果承認藝術有獨立的無限的價值，藝術家有完成藝術本身最終目的之必要，那末我們便不能而且不應該撇開藝術價值去指摘藝術家的態度，這和拿藝術家的現實行爲去評斷他的藝術作品者一樣可笑。波特來耳的詩並不因他的狂放而稍減其價值。淺薄者許要咒他爲人羣的蛇蝎，卻不知道他底厭棄人生，正是他的渴慕人生之反一面的表白。我們平常譏刺一個人，還須觀察到他的深處，否則便見得浮薄可鄙。至于拿了自己的似是而非的標準，既沒有看到他的深處，又拋棄了衡量藝術價值的尺度，便無的放矢地攻刺一個忠于藝術的人，真的糊塗呢還是別有用意！這不過使我們覺到此刻現在的中國文藝界真不值一談，因爲以批評成名而又是創造自許的所謂文藝家者，還是這樣地崇奉功利主義呵！

我——自然不是什麼文藝家——喜歡讀些高級的文藝作品，頗多古舊的東西，很有人說這是迷舊的的時代擯棄者。他們告訴我，現在是民衆文藝當世了，嶄新的專爲第四階級玩味的文藝當世了。我爲之愕然者久之，便問他們：民衆文藝怎樣寫法？文藝家用什麼手段，使民衆都能玩味？現在民衆文藝已產生了若干部？革了命之後的民衆能够賞識所謂民衆文藝者已有幾分之幾？莫非現在有許多新三字經，或新神童詩出版了麼？我真不知民衆化的文藝如何化法，化在內容呢，那我們本有表現民衆生活的文藝了的；化在技藝上吧，那末一首國民革命歌儘够充數了，你聽：「國民革命成功……齊歡唱……」多麼宏壯而明白呵！我們爲什麼要別的文藝？他們不能明確地回答，而我也糊塗到而今。此刻現在，纔從民衆主義與天才一文裏得了答案，是：

「無論民衆藝術如何地主張藝術的普遍性或平等性，但藝術作品無論如何有無限的價值等差，這個事實是不可否認的。所謂普遍性啦，平等性啦這一類話，意思不外乎是說藝術的內容是關於廣衆的民間生活或關於人生的普遍事象，而有這種內容的藝術，始可以供給一般民衆的玩味。藝術備有像這種意味的普遍性和平等性不待說是不

可以否認的，然而藝術作品既有無限的價值等級存在以上，那些比較高級的藝術品好，就可以說多少能够供給一般民衆的玩味，若要說一切人都能够一樣的精細，一樣的深刻，一樣的微妙——換句話說，絕對平等的來玩味牠，那無論如何是不得有的事實。」

記得有人說過這樣的話：最先進的思想只有站在最高層的先進的少數人能够了解，等到這種思想透入羣衆裏去的時候，已經不是先進的思想了。這些話，是告訴我們芸衆生，到底有一大部分感覺不敏的。世界上有這樣的不平等，除了詛咒造物者的不公，我們還能怨誰呢？這是事實。如果不是事實，人類的演進史，可以一筆抹殺，而革命也不能發生了。世界文化的推進，全賴少數先覺之衝鋒陷陣，如果各個人的聰明才智，都是相等，文化也早就發達到極致了，世界也就大同了，所謂「螺旋式進行」一句話，還不是等于廢話？藝術是文化的一部，文化有進退，藝術自不能除外。民衆化的藝術，以藝術本身有無限的價值等差來說，簡直不能成立。自然，藉文藝以革命這夢嚮，也終究是一種夢嚮罷了！

以上是我的意思，未知先生以爲如何？

一九二八，三，二五，冬芳。

回信

冬芬先生：

我不是批評家，因此也不是藝術家，因為現在要做一個什麼家，總非自己或熟人兼做批評不可，沒有一夥，是不行的，至少在現在的上海灘上。因為並非藝術家，所以並不以為藝術特別崇高，正如自己不賣膏藥，便不來打拳讚藥一樣。我以為這不過是一種社會現象，是時代的人生記錄，人類如果進步，則無論他所寫的是外表，是內心，總要陳舊，以至滅亡的。不過近來的批評家，似乎很怕這兩個字，只想在文學上成仙。

各種主義的名稱的勃興，也是必然的現象。世界上時時有革命，自然會有革命文學。世界上的民衆很有些覺醒了，雖然有許多在受難，但也多少占權，那自然也會有民衆文學——說得澈底一點，則第四階級文學。

中國的批評界怎樣的趨勢，我卻不大了然，也不很注意。就耳目所及，只覺得各專家所用的尺度非常多，有英國尺，有美國尺，有德國尺，有俄國尺，有日本尺，自然又有中國尺，或者

兼用各種尺。有的說要真正，有的說要鬭爭，有的說要超時代，有的躲在人背後說幾句短短的冷話。還有，是自己擺着文藝批評家的架子，而憎惡別人的鼓吹了創作。倘無創作，將批評什麼呢，這是我所不能懂得他的心腸的。

別的此刻不談。現在所號稱革命文學家者，是鬭爭和所謂超時代。超時代其實就是逃避，倘自己沒有正視現實的勇氣，又要掛革命的招牌，便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必然地要走入那一條路的身在現世，怎麼離去？這是和說自己用手提着耳朵，就可以離開地球者一樣地欺人。社會停滯着，文藝決不能獨自飛躍，若在這停滯的社會裏居然滋長了，那倒是爲這社會所容，已經離開革命，其結果，不過多賣幾本刊物，或在大商店的刊物上掙得揭載稿子的機會罷了。

鬭爭呢，我倒以爲是對的。人被壓迫了，爲什麼不鬭爭？正人君子者流深怕這一着，于大罵「偏激」之可惡，以爲人人應該相愛，現在被一班壞東西教壞了。他們飽人大約是愛餓人的，但餓人卻不愛飽人，黃巢時候，人相食，餓人尙且不愛餓人，這實在無須鬭爭文學作怪。我是不相信文藝的旋乾轉坤的力量，但倘有人要在別方面應用他，我以爲

也可以。譬如「宣傳」就是。

美國的辛克來兒說：一切文藝是宣傳。我們的革命的文學者曾經當作寶貝，用大字印出過；而嚴肅的批評家又說他是「淺薄的社會主義者」。但我——也淺薄——相信辛克來兒的話。一切文藝，是宣傳，只要你一給人看。即使個人主義的作品，一寫出，就有宣傳的可能，除非你不作文，不開口。那麼，用於革命，作為工具的一種，自然也可以的。

但我以為當先求內容的充實和技巧的上達，不必忙于掛招牌。「稻香村」、「陸稿薦」已經不能打動人心了，「皇太后鞋店」的顧客，我看見也並不比「皇后鞋店」裏的多。一說「技巧」，革命文學家是要討厭的。但我以為一切文藝固是宣傳，而一切宣傳卻並非全是文藝，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將白也算作色），而凡顏色未必都是花一樣。革命之所以于口號、標語、布告、電報、教科書……之外，要用文藝者，就因為牠是文藝。但中國之所謂革命文學，似乎又作別論。招牌是掛了，卻只在吹噓同夥的文章，而對子目前的暴力和黑暗不敢正視。作品雖然也有些發表了，但往往是拙劣到連報章記事都不如；或則將劇本的動作辭句都推到演員的「昨日的文學家」身上去。那麼，剩下來的

思想的內容一定是很革命底了罷？我給你看看兩句馮乃超的劇本的結末的的警句：

『野雉：我再不怕黑暗了。』

偷兒：我們反抗去！』

四月四日。魯迅。

扁

中國文藝界上可怕的現象，是在儘先輸入名詞，而並不介紹這名詞的函義。

于是各各以意爲之。看見作品上多講自己，便稱之爲表現主義；多講別人，是寫實主義；見女郎小腿肚作詩，是浪漫主義；見女郎小腿肚不准作詩，是古典主義；天上掉下一顆頭，頭上站着一頭牛，愛呀，海中央的青霹靂呀……是未來主義……等等。

還要由此生出議論來。這個主義好，那個主義壞……等等。

鄉間一向有一個笑談：兩位近視眼要比眼力，無可質證，便約定到關帝廟去看這一天新掛的扁額。他們都從漆匠探得字句。但因爲探來的詳略不同，只知道大字的那一個便不服，爭執起來了，說看見小字的人是說謊的。又無可質證，只好一同探問一個過路的

人。那人望了一望，回答道：「什麼也沒有。扁還沒有掛哩。」

我想，在文藝批評上要比眼力，也總得先有那塊扁額掛起來纔行。空空洞洞的爭，實在只有兩面自己心裏明白。

(四月十日。)

路

又記起了Golon做的巡按使的故事——

中國也譯出過的。一個鄉間忽然紛傳皇帝使者要來私訪了，官員們都很恐怖，在客棧裏尋到一個疑似的人，便硬拉來奉承了一通。等到奉承十足之後，那人跑了，而聽說使者真到了，全臺演了一個啞口無言劇收場。

上海的文界今年是恭迎無產階級文學使者，沸沸揚揚，說是要來了。問問黃包車夫，車夫說並未派遣。這車夫的本級意識形態不行，早被別階級弄歪曲了罷。另外有人把握着，但不一定是工人。于是只好在大屋子裏尋，在客店裏尋，在洋人家裏尋，在書鋪子裏尋，在咖啡館裏尋……。

文藝家的眼光要超時代，所以到否雖不可知，也須先行擁篲清道，或者僂僕奉迎。于是做人便難起來，口頭不說「無產」便是「非革命」還好；「非革命」即是「反革命」可就險了。這真要沒有出路。

現在的人間也還是「大王好見，小鬼難當」的處所，出路是有的。何以無呢？只因多鬼祟，他們將一切路都要糟蹋了。這些都不要，求出路。自己坦坦白白，聲明了因爲沒法子，只好暫在礮屁股上掛一掛招牌，倒也是出路的萌芽。

「地火在地下運行，奔突；熔岩一旦噴出，將燒盡一切野草，以及喬木，於是並且無可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將大笑，我將歌唱。」（野草序）

還只說說，而革命文學家似乎不敢看見了，如果因此覺得沒有了出路，那可實在是
很可憐，令我也有些不忍再動筆了。

（四月十日。）

頭

三月二十五日的申報上有一篇梁實秋教授的關於盧騷，以為引辛克來兒的話來攻擊白璧德，是『借刀殺人』，『不一定是好方法。』至于他之攻擊盧騷，理由之二，則在『盧騷個人不道德的行為，已然成爲一般浪漫文人行爲之標類的代表，對於盧騷的道德的攻擊，可以說即是給一般浪漫的人的行為的攻擊……』

那麼，這雖然並非『借刀殺人』，卻成了『借頭示衆』了。假使他沒有成爲『一般浪漫文人行爲之標類的代表』，就不至于路遠迢迢，將他的頭掛給中國人看。一般浪漫文人，總算害了遙拜的祖師，給了他一個死後也不安靜。他現在所受的罰，是因爲影響罪，不是本罪了，可歎也夫！

以上的話不大「謹飭」，因為梁教授不過要筆伐，並未說須掛盧騷的頭，說到掛頭，是我看了今天申報上載湖南共產黨郭亮「伏誅」後，將他的頭掛來掛去，「遍歷長岳」，偶然拉扯上去的。可惜湖南當局，竟沒有寫了列寧（或者湖而上之，到馬克斯；或者更湖而上之，到黑格爾等等）的道德上的罪狀，一同張貼，以正其影響之罪也。湖南似乎太缺少批評家。

記得三國志演義記袁術（？）死後，後人有詩歎道：「長揖橫刀出，將軍蓋代雄，頭顱行萬里，失計殺田豐。」當三個有閒之暇，也活剝一首來弔盧騷：——

「脫帽懷鉛出，先生蓋代窮。頭顱行萬里，失計造兒童。」

（四月十日。）

通信

來信

魯迅先生：

精神和肉體，已被困到這般地步——怕無以復加，也不能形容——的我，不得不撐了病體向「你老」作最後的呼聲了！——不，或者說求救，甚而是警告！

好在你自己也極明白：你是在給別人安排酒筵，「泡製醉蝦」的一個人。我就是其間被製的一個！

我，本來是個小資產階級裏的驕子，溫鄉裏的香花。有喫有着，儘可安閒地過活。只要夢想着的「方帽子」到手了也就滿足，委實一無他求。

「吶喊出版了，語絲發行了（可憐新青年時代，我尙看不懂呢，）說鬚鬚，論照相之類一篇篇連續地戟刺着我的神經。當時，自己雖是青年中之尤青者，然而因此就感到同伴們的淺薄和盲目。『革命！革命！』的叫賣，在馬路上吶喊得洋溢，隨了所謂革命的勢力，也奔騰澎湃了。我，確竟被其吸引。當然也因为我嫌棄青年的淺薄，且在想自己生命上找一條出路。那知竟又被我認識了人類的欺詐，虛偽，陰險……的本性！果然，不久，軍閥和政客們棄了身上的蒙皮，而顯出本來的猙獰面目！我呢，也隨了所謂『清黨』之聲而把我一顆沸騰着的熱烈的心清去。當時想：『素以敦厚誠樸』的第四階級，和那些『遜世之士』的『居士』們，或許尙足爲友吧？——唉，真的，『令弟』豈明先生說得是：『中國雖然有階級，可是思想是相同的，都是升官發財，』而且我幾疑置身在紀元前的社會裏了，那種愚蠢比鹿豕還要愚蠢的言動（或者國粹家正以爲這是國粹呢！）真不禁令我茫然——茫然於叫我究竟怎麼辦呢？

利，莫利於失望之矢。我失望，失望之矢貫穿了我的心，於是乎吐血。轉輾牀上不能動已幾個月！

不錯，沒有希望之人應該死，然而我沒有勇氣，而且自己還年青，僅僅廿一歲。還有愛人，不死，則精神和肉體，都在痛苦中挨生活，差不多每秒鐘。愛人亦被生活所壓迫着。我自己，薄薄的遺產已被「革命」革去了。所以非但不能相慰，相對亦徒唏噓！

不識不知幸福了，我因之痛苦。然而施這毒藥者是先生，我實完全被先生所「泡製」。先生，我既已被引至此，索性請你指示我所應走的最終的道路。不然，則請你麻痺了我的神經，因為不識不知是幸福的，好在你是習醫，想必不難「還我頭來！」我將效梁遇春先生（？）之言而大呼。

末了，更勸告你的：「你老」現在可以歇歇了，再不必為軍閥們趕製適口的鮮味，保全幾個像我這樣的青年。倘為生活問題所驅策，則可以多做些「擁護」和「打倒」的文章，以你先生之文名，正不愁富貴之不及，「委員」、「主任」如操左券也。

快呀，請指示我！莫要「為德不卒」！

或北新，或語絲上答覆均可。能免，莫把此信刊出，免笑。

原諒我寫得草率，因病中，之極！

一個被你毒害的青年Y。枕上書。

三月十三日。

回信

Y先生：

我當答覆之前，先要向你告罪，因為我不能如你的所囑，不將來信發表。來信的意思，是要我公開答覆的，那麼，倘將原信藏下，則我的一切所說，便變成『無題詩N百韻』，令人莫名其妙了。況且我的意見，以為這也不足恥笑。自然，中國很有為革命而死掉的人，也很有雖然喫苦，仍在革命的人，但也有雖然革命，而在享福的人……革命而尚不死，當然不能算革命到底，殊無以對死者，但一切活着的人，該能原諒的罷，彼此都不過是靠倖倖，或靠狡滑，巧妙。他們只要用鏡子略略一照，大概就可以收起那一副英雄嘴臉來的。

我在先前，本來也還無須賣文糊口的，拿筆的開始，是在應朋友的要求。不過大約心裏原也藏着一點不平，因此動起筆來，每不免露些憤言激語，近於鼓動青年的樣子。段祺瑞執政之際，雖頗有人造了謠言，但我敢說，我們所做的那些東西，決不沾別國的半個盧

布，閩人的一文津貼，或者書鋪的一點稿費。我也不想充「文學家」，所以也從不連絡一班同夥的批評家叫好。幾本小說銷到上萬，是我想也沒有想到的。

至于希望中國有改革，有變動之心，那的確是有一點。雖然有人指定爲我沒有出路——哈哈，出路，中狀元慶——的作者，「毒筆」的文人，但我自信並未抹殺一切。我總以爲下等人勝于上等人，青年勝於老頭子，所以從前並未將我的筆尖的血，灑到他們身上去。我也知道一有利害關係的時候，他們往往也就和上等人老頭子差不多了，然而這是在這樣的社會組織之下，勢所必至的事。對於他們，攻擊的人又正多，我何必再來助一下石呢，所以我所揭發的黑暗是只有一方面的，本意實在並不在欺蒙閱讀的青年。

以上是我尚在北京，就是成仿吾所謂「蒙在鼓裏」做小資產階級時候的事。但還是因爲行文不慎，飯碗敲破了，並且非走不可了，所以不待「無煙火藥」來轟，使輾轉跑到了「革命策源地」。住了兩月，我就駭然，原來往日所聞，全是謠言，這地方，卻正是軍人和商人所主宰的國土。于是接着是清黨，詳細的事實，報章上是不大見的，只有些風聞。我正有些神經過敏，于是覺得正像是一「聚而殲旃」，很不免哀痛。雖然明知道這是「淺薄

的人道主義，」不時髦已經有兩三年了，但因為小資產階級根性未除，于心總是戚戚。那時我就想到我恐怕也是安排筵宴的一個人，就在答有恆先生的信中，表白了幾句。

先前的我的言論的確失敗了，這還是因為我料事之不明。那原因，大約就在多年「坐在玻璃窗下，醉眼朦朧看人生」的緣故。然而那麼風雲變幻的事，恐怕世界上是不多有的，我沒有料到，未曾描寫，可見我還不很有「毒筆」。但是，那時的情形，卻連在十字街頭，在民間，在官間，前看五十年的超時代的革命文學家也似乎沒有看到，所以毫不先行「理論鬭爭」。否則，該可以救出許多人的罷。我在這裡引出革命文學家來，並非要在事後譏笑他們的愚昧，不過是說，我的看不到後來的變幻，乃是我還欠刻毒，因此便發生錯誤，並非我和什麼人協商，或自己要做什么，立意來欺人。

但立意怎樣，於事實是無干的。我疑心喫苦的人們中，或不免有看了我的文章，受了刺戟，於是挺身而出而革命的青年，所以實在很苦痛。但這也因為我天生的不是革命家的緣故，倘是革命鉅子，看這一點犧牲，是不算一回事的。第一是自己活着，能永遠做指導，因為沒有指導，革命便不成功了。你看革命文學家，就都在上海租界左近，一有風吹草動，就

有洋鬼子造成的鐵絲網，將反革命文學的華界隔離，於是從那裏面擲出無烟火藥——約十萬兩——來，轟然一聲，一切有閒階級便都「奧伏赫變」了。

那些革命文學家，大抵是今年發生的，有一大串。雖然還在互相標榜，或互相排斥，我也分不清是「革命已經成功」的文學家呢，還是「革命尙未成功」的文學家。不過似乎說是因為有了我的一本吶喊或野草，或我們印了語絲，所以革命還未成功，或青年懶于革命了。這口吻卻大家大略一致的。這是今年革命文學界的輿論。對於這些輿論，我雖然又好氣又好笑，但也頗有些高興。因為雖然得了延誤革命的罪狀，而一面卻免去誘殺青年的內疚了。那麼，一切死者，傷者，喫苦者，都和我無關。先前真是擅負責任。我先前是立意要不講演，不教書，不發議論，使我的名字從社會上死去，算是我的贖罪的，今年倒心裏輕鬆了，又有些想活動。不料得了你的信，卻又使我的心沈重起來。

但我已經沒有去年那麼沈重。近大半年來，徵之輿論，按之經驗，知道革命與否，還在其人，不在文章的。你說我毒害了你了，但這裏的批評家，卻明明說我的文字是「非革命」的。假使文學足以移人，則他們看了我的文章，應該不想做革命文學了，現在他們已經看

了我的文章，斷定是「反革命」而仍不灰心，要做革命文學者，可見文字于人，實在沒有什麼影響，——只可惜是同時打破了革命文學的牌坊。不過先生和我素昧平生，想來決不至于誣栽我，所以我再從別一面來想一想。第一，我以為你膽子太大了，別的革命文學家，因為我描寫黑暗，便嚇得屁滾尿流，以為沒有出路了，所以他們一定要講最後的勝利，付多少錢終得多少利，像人壽保險公司一般。而你並不計較這些，偏要向黑暗進攻，這是喫苦的原因之一。既然太大膽，那麼，第二，就是太認真。革命是也有種種的。你的遺產被革去了，但也有將遺產革來的，但也有連性命都革去的，也有只革到薪水，革到稿費，而倒捐了革命家的頭銜的。這些英雄，自然是認真的，但若較原先更有損了，則我以為其病根就在「太」。第三，是你還以為前途太光明，所以一碰釘子，便大失望，如果先前不期必勝，則即使失敗，苦痛恐怕會小得多罷。

那麼，我沒有罪戾麼？有的，現在正有許多正人君子 and 革命文學家，用明槍暗箭，在辦我革命及不革命之罪，將來我所受的傷的總計，我就劃一部分賠償你的尊「頭」。

這里添一點考據：「還我頭來」這話，據三國志演義，是關雲長夫子說的，似乎並非

梁遇春先生

以上其實都是空話。一到先生個人問題的陣營，倒是十分難於動手了，這決不是什麼「前進呀，殺呀，青年呵」那樣英氣勃勃的文字所能解決的。真話呢，我也不想公開，因為現在還是言行不大一致的好。但來信沒有住址，無法答覆，只得在這里說幾句。第一要謀生之道，則不擇手段。且住，現在很有些沒分曉漢，以為「問目的不問手段」是共產黨的口訣，這是大錯的。人們這樣的很多，不過他們不肯說出口。蘇俄的學藝教育人民委員盧那卡爾斯基所作的被解放的吉訶德先生裏，將這手段使一個公爵使用，可見也是貴族的東西，堂皇冠冕。第二，要愛護愛人。這據輿論，是大背革命之道的。但不要緊，你只要做幾篇革命文字，主張革命青年不該講戀愛就好了。只是假如有一個有權者或什麼敵前來問罪的時候，這也許仍要算一條罪狀，你會後悔輕信了我的話。因此，我得先行聲明：等到前來問罪的時候，倘沒有這一節，他們就會找別一條的。蓋天下的事，往往決計問罪在先，而搜集罪狀（普通是十條）在後也。

先生，我將這樣的話寫出，可以略蔽我的過錯了罷。因為只這一點，我便可以又受許

多傷。先是革命文學家就要哭罵道：「虛無主義者呀，你這壞東西呀！」嗚呼，一不謹慎，又在新英雄的鼻子上抹了一點粉了。趁便先辯幾句罷：無須大驚小怪，這不過不擇手段的手段，還不是主義哩。即使是主義，我敢寫出，肯寫出，還不算壞東西。等到我壞起來，就一定將這些寶貝放在肚子裏，手頭集許多錢，住在安全地帶，而主張別人必須做犧牲。

先生，我也勸你暫時玩玩罷，隨便弄一點糊口之計，不過我並不希望你永久「沒落」。有能改革之處，還是隨時可以順手改革的，無論大小。我也一定遵命，不但「歇歇」而且玩玩。但這也並非因為你的警告，實在是原有此意的了。我要更加講趣味，尋閒暇，即使偶然涉及什麼，那是文字上的疏忽，若論「動機」或「良心」，卻也許並不這樣的。

紙完了，回信也即此爲止。並且順頌

痊安，又祝

令愛人不挨餓。

魯迅。

四月十日。

太平歌訣

四月六日的申報上有這樣的一段記事：

南京市近日忽發現一種無稽謠傳，謂總理墓行將工竣，石匠有攝收幼童靈魂，以合龍口之舉。市民以訛傳訛，自相驚擾，因而家家幼童，左肩各懸紅布一方，上書歌訣四句，藉避危險。其歌訣約有三種：（一）人來叫我魂，自叫自當承。叫人叫不着，自己頂石墳。（二）石叫石和尚，自叫自承當。急早回家轉，免去頂墳壇。（三）你造中山墓，與我何相干？一叫魂不去，再叫自承當（後略）。

這三首中的無論那一首，雖只寥寥二十字，但將市民的見解，對於革命政府的關係，對於革命者的感情，都已經寫得淋漓盡致。雖有善於暴露社會黑暗面的文學家，恐怕也

難有做到這麼簡明深切的了。「叫人叫不着，自己頂石墳。」則竟包括了許多革命者的傳記和一部中國革命的歷史。

看看有些人們的文字，似乎硬要說現在是「黎明之前。」然而市民是這樣的市民，黎明也好，黃昏也好，革命者們總不能背着這一夥市民進行。雞肋，棄之不甘，食之無味，就要這樣地牽纏下去。五十一年後能否就有出路，是毫無把握的。

近來的革命文學家往往特別畏懼黑暗，掩藏黑暗，但市民卻毫不客氣，自己表現了。那小巧的機靈和這厚重的麻木相撞，便使革命文學家不敢正視社會現象，變成婆婆媽媽，歡迎喜鵲，憎厭梟鳴，只檢一點吉祥之兆來陶醉自己，于是就算超出了時代。

恭喜的英雄，你前去罷，被遺棄了的現實的現代，在後面恭送你的行旌。

但其實還是同在。你不過閉了眼睛。不過眼睛一閉，「頂石墳」卻可以不至于了，這就是你的「最後的勝利。」

（四月十日。）

劇共大觀

仍是四月六日的申報上，又有一段長沙通信，敘湘省破獲共產黨省委會，「處死刑者三十餘人，黃花節斬決八名。」其中有幾處文筆做得極好，抄一點在下面——

……是日執行之後，因馬（淑純，十六歲）志純（十四歲）傅（鳳君，二十四歲）三犯，係屬女性，全城男女往觀者，終日人山人海，擁擠不通。加以共魁郭亮之首級，又懸之司門口示衆，往觀者更衆。司門口八角亭一帶，交通爲之斷絕。計南門一帶民衆，則看郭亮首級後，又赴教育會看女屍。北門一帶民衆，則在教育會看女屍後，又往司門口看郭首級。全城擾攘，劇共空氣，爲之驟張；直至晚間觀者始不似日間之擁擠。

抄完之後，覺得頗不妥。因為我就想發一點議論，然而立刻又想到恐怕一面有人疑心我在冷嘲（有人說，我是只喜歡冷嘲的），一面又有人責罰我傳播黑暗，因此咒我滅亡，自己帶着一切黑暗到地底裏去。但我熬不住，——別的議論就少發一點罷，單從「爲藝術的藝術」說起來，你看這不過一百五六十字的文章，就多麼有力。我一讀，便彷彿看見司門口掛着一顆頭，教育會前列着三具不連頭的女屍。而且至少是赤膊的，——但這也許我猜得不對，是我自己太黑暗之故。而許多「民衆」一批是由北往南，一批是由南往北，擠着，嚷着……再添一點蛇足，是臉上都表現着或者正在神往，或者已經滿足的神情。在我所見的「革命文學」或「寫實文學」中，還沒有遇到過這麼強有力的文學。批評家羅喀綏夫斯奇說的罷：「安特別夫竭力要我們恐怖，我們卻並不怕，契訶夫不這樣，我們倒恐怖了。」這百餘字實在抵得上小說一大堆，何況又是事實。

且住。再說下去，恐怕有些英雄們又要責我散佈黑暗，阻礙革命了。一理是也有一理的，現在易犯嫌疑，忠實同志被誤解爲共黨，或關或釋的，報上向來常見萬一不幸，沈冤莫白，那真是……倘使常常提起這些來，也許未免會短壯士之氣。但是，革命被頭掛退的事

是很少有的，革命的完結，大概只由于投機者的潛入。也就是內裏蛀空。這並非指赤化，任何主義的革命都如此。但不是正因為黑暗，正因為沒有出路，所以要革命的麼？倘必須前面貼着『光明』和『出路』的包票，這纔雄赳赳地去革命，那就不但不是革命者，簡直連投機家都不如了。雖是投機，成敗之數也不能預卜的。

我臨末還要揭出一點黑暗，是我們中國現在（現在！不是超時代的）的民衆，其實還不很管什麼黨，只要看『頭』和『女屍』。只要有，無論誰的都有人看，拳匪之亂，清末黨獄，民二，去年和今年，在這短短的二十年中，我已經目覩或耳聞了好幾次了。

（四月十日。）

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

英勇的刊物是層出不窮，『文藝的分野』上的確熱鬧起來了。日報廣告上的戰線這名目就惹人注意，一看便知道其中都是戰士。承蒙一個朋友寄給我三本，纔得看見了一點鎗煙，並且明白弱水做的談中國現在的文學界裏的有一粒彈子，是瞄準着我的。爲什麼呢？因爲先是『醉眼』中的朦朧做錯了。據說錯處有三：一是態度，二是氣量，三是年紀。複述易於失真，還是將這粒子彈移置在下面罷：

『魯迅那篇，不敬得很，態度太不興了。我們從他先後的論戰上看來，不能不說他的量氣太窄了。最先（據所知）他和西澤戰，繼和長虹戰，我們一方面覺得正直是在他這面，一方面又覺得辭鋒太有點尖酸刻薄，現在又和創造社戰，

辭鋒仍是尖酸，正直卻不一定落在他這面。是的，仿吾和初梨兩人對他的批評，是可以有反駁的地方，但這應莊嚴出之，因為他們所走的方向不能算不對，冷嘲熱刺，只有對於冥頑不靈者為必要，因為是不可理喻。對於熱烈猛進的絕對不合用這種態度。他那種態度，雖然在他自己亦許覺得罵得痛快，但那種口吻，適足表出「老頭子」的確不行吧了。好吧，這事本該是沒有勉強的必要和可能，讓各人走各人的路去好了。我們不禁想起了五四時的林琴南先生了！

這一段雖然並不涉及是非，只在態度量氣口吻上，斷定這「老頭子」的確不行，從此又自然而然地抹殺我那篇文字，但粗粗一看，卻很像第三者從旁的批評。從我看來，「尖酸刻薄」之處也不少，作者大概是青年，不會有「老頭子」氣的，這恐怕因為我「冥頑不靈」不得已而用之的罷，或者便是自己不覺得。不過我要指摘，這位隱姓埋名的弱水先生，其實是創造社那一面的。我並非說，這些戰士，大概是創造社裏常見他的腳踪，或在藝術大學裏兼有一隻飯碗，不過指明他們是相同的氣類。因此，所謂戰線，也仍不過是創造社的戰線。所以我和西澧、長虹戰，他雖然看見正直，卻一聲不響，今和創造社戰，便只

看見尖酸，忽然顯戰士身而出現了。其實所斷定的先兩回的我的「正直」也還是死了已經兩千多年了的老頭子老聃先師的「將欲取之必先與之」的戰略，我並不感服這類的公評。陳西澧也知道這種戰法的，他因為要打倒我的短評，便稱讚我的小說，以見他之公正。

即使真以為先兩回是正直在我這面的罷，也還是因為這位弱水先生是不和他們同系、同社、同派、同流……從他們那一面看來，事情可就兩樣了。我「和西澧戰」了以後，現代系的唐有壬曾說語絲的言論，是受了墨斯科的命令；「和長虹戰」了以後，狂誕派的常燕生曾說狂誕的停版，也許因為我的陰謀。但除了我們兩方以外，恐怕不大人注意或記得了罷。事不干己，是很容易滑過去的。

這次對於創造社，是的，「不敬得很」，未免有些不「莊嚴」；即使在我以為是直道而行，他們也仍可認為「尖酸刻薄」。於是「論戰」便變成「態度戰」，「量氣戰」，「年齡戰」了。但成仿吾輩的對我的「態度」，戰士們雖然不屑留心到，在我本身是明白的。我有兄弟，自以為算不得就是「不可理喻」，而這位批評家于吶喊出版時，即加以譏

刺道：「這回由令弟編了出來，真是好看得多了。」這傳統直到五年之後，再見于馮乃超的論文，說是「無聊賴地跟他弟弟說幾句人道主義的美麗的說話。」我的主張如何且不論，即使相同，何以說話相同便是「無聊賴地？」莫非一有「弟弟」，就必須反對，一個講革命，一個即該講保皇，一個學地理，一個就得學天文麼？還有，我合印一年的雜感爲華蓋集，另印先前所鈔的小說史料爲小說舊聞鈔，是並不相干的。這位成仿吾先生卻加以編排道：「我們的魯迅先生坐在華蓋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說舊聞。」這使李初梨很高興，今年又抄在文化批判裏，還樂得不可開交道，「他（成仿吾）這段文章，比「趣味文學」還更有趣些。」但是還不够，他們因爲我生在紹興，紹興出酒，便說「醉眼陶然」；因爲我年紀比他們大了，便說「老生」還要加注道：「若許我用文學的表現。」而這一個「老」的錯處，還給「戰線」上的弱水先生作爲「的確不行」的根源。我自信對於創造社，還不至於用了他們的籍貫、家族、年紀，來作奚落的資料，不過今年偶然做了一篇文章，其中第一次指摘了他們文字裏的矛盾和笑話而已。但是「態度」問題來了，「量氣」問題也來了，連戰士也以爲尖酸刻薄。莫非必須我學革命文學家所指爲「卑污」的託爾斯泰，

毫無抵抗，或者上一呈文：「小資產階級或有產階級臣魯迅誠恐惶恐謹呈革命的「印貼利更追亞」老爺麾下，」這纔不至於「的確不行」麼？

至于我是「老頭子」，卻的確是我的不行。「和長虹戰」的時候，他也曾指出我這一條大錯處，此外還嘲笑我的生病。而且也是真的，我的確生過病，這回弱水這一位「小頭子」對於這一節沒有話說，可見有些青年究竟還懷着純朴的心，很是厚道的。所以他將「冷嘲熱刺」的用塗，也瓜分開來，給「熱烈猛進的」製定了優待條件。可惜我生得太早，已經不屬於那一類，不能享受同等待遇了。但幸而我年青時沒有真上戰線去，受過創傷，倘使身上有了殘疾，那就又添一件話柄，現在真不知道要受多少奚落哩。這是「不革命」的好處，應該感謝自己的。

其實這回的不行，還只是我不行，無關年紀的。託爾斯泰、克羅頗特庚、馬克斯，雖然言行有「卑污」與否之分，但畢竟都苦鬪了一生，我看看他們的照相，全有大鬍子。因為我一個而抹殺一切「老頭子」大約是不算公允的。然而中國呢，自然不免又有些特別，不行的多。少年尙且老成，老年當然成老。林琴南先生是確乎應該想起來的，他後來真是暮

年景象，因為反對白話，不能論戰，便從橫道兒來做一篇影射小說，使一個武人痛打改革者——說得『美麗』一點，就是神往于『武器的文藝』了。舊的和新的，往往有極其相同之點——如個人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往往都反對資產階級，保守者和改革者往往都主張為人生的藝術，都諱言黑暗，棒喝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都厭惡人道主義等——林琴南先生的事也正是一個證明。至于所以不行之故，其關鍵就全在他生得更早，不知道這一階級將被『奧服赫變』及早變計，于是歸根結蒂，分明現出 Fascisti 本相了。但我以為『老頭子』如此，是不足慮的，他總比青年先死。林琴南先生就早已死去了。可怕的是將為將來柱石的青年，還像他的東拉西扯。

又來說話，量氣又太小了，再說下去，就要更小，『正直』豈但『不一定』在這一面呢，還要一定不在這一面。而且所說的又都是自己的事，並非『大貧』的民衆……但是，即使所講的只是個人的事，有些人固然只看見個人，有些人卻也看見背景或環境。例如魯迅在廣東這一本書，今年戰士們忽以為編者和被編者希圖不朽，于是看得『煩躁』也給了一點對於『冥頑不靈』的冷嘲。我卻以為這太偏於唯心論了，無所謂不朽，不朽

又幹嗎，這是現代人大抵知道的。所以會有這一本書，其實不過是要黑字印在白紙上，訂成一本，作商品出售罷了。無論是怎樣泡製法，所謂「魯迅」也者，往往不過是充當了一種的材料。這種方法，便是「所走的方向不能算不對」的創造社也在所不免的。託羅茲基雖然已經「沒落」，但他會說，不含利害關係的文章，當在將來另一制度的社會裏。我以爲他這話卻還是對的。

(四月廿日。)

革命咖啡店

革命咖啡店的革命底廣告式文字，昨天在報章上看到了，仗着第四個「有閒，」先抄一段在下面——

「……但是讀者們，我卻發現了這樣一家我們所理想的樂園，我一共去了兩次，我在那裏遇見了我們今日文藝界上的名人，龔冰廬、魯迅、郁達夫等。並且認識了孟超、潘漢年、葉靈鳳等，他們有的在那裏高談着他們的主張，有的在那裏默默沈思，我在那裏領會到不少教益呢。……」

遙想洋樓高聳，前臨闊街，門口是晶光閃灼的玻璃招牌，樓上是「我們今日文藝界上的名人，」或則高談，或則沈思，面前是一大杯熱氣蒸騰的無產階級咖啡，遠處是許許

多多「醜醜的農工大衆」他們喝着，想着，談着，指導着，獲得着，那是，倒也實在是「理想的樂園。」

何況既喝咖啡，又領「教益」呢？上海灘上，一舉兩得的買賣本來多。大如弄幾本雜誌，便算革命；小如買多少錢書籍，即贈送真絲光襪或請喫冰淇淋——雖然我至今還猜不透那些惠顧的人們，究竟是意在看書呢，還是要穿絲光襪。至于咖啡店，先前只聽說不過可以兼看舞女、使女，「以飽眼福」罷了。誰料這回竟是「名人」給人「教益」還演「高談」，「沈思」種種好玩的把戲，那簡直是現實的樂園了。

但我又有幾句聲明——

就是這樣的咖啡店裏，我沒有上去過，那一位作者所「遇見」的，又是別一人。因爲：一、我是不喝咖啡的，我總覺得這是洋大人所喝的東西（但這也許是我的「時代錯誤」）不喜歡，還是綠茶好。二、我要抄「小說舊聞」之類，無暇享受這樣樂園的清福。三、這樣的樂園，我是不敢上去的，革命文學家，要年青貌美，齒白脣紅，如潘漢年、葉靈鳳，這纔是天生的文豪，樂園的材料；如我者，在戰線上就宣布過一條「滿口黃牙」的罪狀，到那里去

高談，豈不褻瀆了「無產階級文學」麼？還有四，則即使我要上去，也怕走不到，至多，只能在店後門遠處彷徨彷徨，嗅嗅咖啡渣的氣息罷了。你看這裏面不很有些在前線的文豪麼，我卻是「落伍者」，決不會坐在一屋子裏的。

以上都是真話。葉靈鳳革命藝術家曾經畫過我的像，說是躲在酒罈的後面。這事的然否我不談。現在所要聲明的，只是這樂園中我沒有去，也不想去，並非躲在咖啡杯後面在騙人。

蘇州另外有一個魯迅時，我登了一篇啓事，「革命文學家」就挖苦了。但現在仍要自己出手來做一回，一者因為我不是咖啡，不願意在革命店裏做裝點；二是我沒有創造社那麼闊，有一點事就一個律師，兩個律師。

(四月十日。)

文壇的掌故

來信

編者先生：

由最近一個上海的朋友告訴我，滬上的文藝界，近來爲着革命文學的問題，鬧得十分囂。『有趣極了！』這問題，在去年中秋前後，成都的文藝界，同樣也劇烈的爭論過。但鬧得並不『囂』，戰區也不見擴大，便結束。大約除了成都，別處是很少知道有這一回事的。

現在讓我來簡約地說一說。

這爭論的起原，已經過了長時期的醞釀。雙方的主體——贊成革命文學的，是國民日報社。——懷疑他們所謂革命文學的，是九日報社。最先還僅是暗中的鼎峙；接着因

了國民政府在長江一帶逐漸發展，成都的革命文學家，便投機似的成立了革命文藝研究社，來竭力鼓吹無產階級的文學。而湊巧有個署名張拾遺君的談談革命文學一篇論文在那時出現。于是挑起了一班革命文學家的怒，兩面的戰爭，便開始攻擊。

至于兩方面的戰略：革命文學者以爲一切都應該革命，要革命纔有進步，纔順潮流。不革命便是封建社會的餘孽，帝國主義的爪牙。同樣和創造社是以唯物史觀爲根據的。可是又無他們的澈底，而把「文學革命」與「革命文學」并爲一談。——反對者承認「革命文學」和「平民文學」「貴族文學」同爲文學上一種名詞，與文學革命無關，而懷疑其像煞有介事的神聖不可侵犯。且文學不應如此狹義；何況革命的題材，未必多。卽有，隔靴搔癢的寫來，也未必好。是近乎有些「爲藝術而藝術」的說法。加入這戰團的，革命文學方面，多爲「清一色」的會員；而反對系，則半屬不相識的朋友。

這一場混戰的結果，是由革命文藝研究社不欲延長戰線，自願休兵。但何故休兵，局外人是不能猜測的。

關於那次的文件，因「文獻不足」只好從略。

上海這次想必一定很可觀。據我的朋友抄來的目錄看，已頗有洋洋乎之概！可惜重慶方面，還沒有看這些刊物的眼福！

這信只算預備將來『文壇的掌故』起見，並無挑撥，擁護任何方面的意思。廢話已說得不少，就此打住，敬祝

撰安！

徐勻。

十七年七月八日，于重慶。

回信

徐勻先生：

多謝你寫寄『文壇的掌故』的美意。

從年月推算起來，四川的『革命文學』似乎還是去年出版的一本『革命文學論集』（書名大概如此，記不確切了，是丁丁編的）的餘波。上海今年的『革命文學』不妨說是又一幕。至于『囂』與不『囂』，那是要憑耳聞者的聽覺的銳鈍而定了。

我在『革命文學』戰場上，是『落伍者』，所以中心和前面的情狀，不得而知，但向

他們屁股那面望過去，則有成仿吾司令的創造月刊，文化批判，流沙，蔣光X（恕我還不知道現在已經改了那一字）拜帥的太陽，王獨清領頭的我們，青年革命藝術家葉靈鳳獨唱的戈壁；也是青年革命藝術家潘漢年編撰的現代小說和戰線；再加一個真是「跟在弟弟背後說漂亮話」的潘梓年的速成的洪荒。但前幾天看見K君對日本人的談話（見戰旗七月號）纔知道潘葉之流的「革命文學」是不算在內的。

含混地只講「革命文學」當然不能澈底，所以今年在上海所掛出來的招牌卻確是無產階級文學，至于是否以唯物史觀為根據，則因為我是外行，不得而知。但一講無產階級文學，便不免歸結到鬪爭文學，一講鬪爭，便只能說是最高的政治鬪爭的一翼。這在俄國，是正當的，因為正是勞農專政；在日本也還不打緊，因為究竟還有一點微微的出版自由，居然也還說可以組織勞動政黨。中國則不然，所以兩月前就變了相，不但改名「新文藝」並且根據了資產社會的法律，請律師大登其廣告，來嚇唬別人了。

向「革命的智識階級」叫打倒舊東西，又拉舊東西來保護自己，要有革命者的名聲，卻不肯喫一點革命者往往難免的辛苦，于是不但笑啼俱備，並且左右不同，連葉靈鳳

所抄襲來的『陰陽臉』也還不足以淋漓盡致地爲他們自己寫照，我以爲這是很可惜，也覺得頗寂寞的。

但這是就大局而言，倘說個人，卻也有已經得到好結果的。例如成仿吾，做了一篇『開步走』和『打發他們去』，又改換姓名（石厚生）做了一點瑞魯迅之後，據日本的無產文藝月刊戰旗七月號所載，他就又走在修善寺溫泉的近旁（可不知洗了澡沒有），並且在那邊被尊爲『可尊敬的普羅塔利亞特作家』，『從支那的勞動者農民所選出的他們的藝術家』了。

魯迅。

八月十日。

文學的階級性

來信

魯迅先生：

侍桁先生譯林癸未夫著的文學上之個人性與階級性，本來這是一篇絕好的文章，但可惜篇末涉及唯物史觀的問題，理論未免是勉強一點，也許是著者的誤解唯物史觀。他說：

「以這種理由若推論下去，有產者的個人性與無產者的個人性，「全個」是不相同的了。就是說不承認有產者與無產者之間有共同的人性。再換一句話說，有產者與無產者只是有階級性，而全然缺少個人性的。」

這是什麼話！唯物史觀的理論，豈是這樣簡單的。牠的理論並不否認個人性，因此，也不否認思想、道德、感情、藝術。但以性格、思想、道德、感情、藝術，都是受支配于經濟的。林氏的文章是着意于個人性，我們就以個人性而論。譬如農村經濟、宗法社會裏拿妻子為男子的財產，但是文化進步到今日的社會，就承認妻子有相當的人格。這個觀念，當然是有產者和無產者所共同的。雖然是共同，卻並非天賦的，仍然逃不了經濟的支配。有產者和無產者物質生活上受經濟的影響而有差等，個人性同樣地受經濟的影響而卻是共同的。並不是有產者和無產者人性的共同，而就是不受經濟制度的影響了。

林氏以此而可以駁唯物史觀，那末，何以不拿「人是同樣的是圓頂方趾，要喫飯，要睡覺，是有產者和無產者所共同的」這來駁唯物史觀，爽快得多了。

最後，我須聲明：我是個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職工。因為是職工，所以學識的謔陋是誰都可以肯定的。這文中自然有不少不能達意和不妥之處。但我希望有更了解馬克斯學說的人來為唯物史觀打一打仗。

因為避學者嫌疑起見，以信底形式而寫給魯迅先生。能否發表，是編者的特權了。

愷良於上海，一九二八，七，二八，二十

回信

愷良先生：

我對汪唯物史觀是門外漢，不能說什麼。但就林氏的那一段文字而論，他將話兩次一換，便成爲『只有』和『全然缺少』，卻似乎決定得太快一點了。大概以弄文學而又講唯物史觀的人，能從基本的書籍上一一鉤剔出來的，恐怕不很多，常常是看幾本別人的提要就算。而這種提要，又因作者的學識意思而不同，有些作者，意在使階級意識明了銳利起來，就竭力增強階級性說，而別一面就容易招人誤解。作爲本文根據的林氏別一篇論文，我沒有見，不能說他是否因此而走了相反的極端，但中國卻有此例，竟會將個性，共同的人性（卽林氏之所謂個人性，）個人主義卽利己主義混爲一談，來加以自以爲唯物史觀底申斥，倘再有人據此來論唯物史觀，那真是糟糕透頂了。

來信的『喫飯睡覺』的比喻，雖然不過是講笑話，但脫羅茲基曾以對於『死之恐

怖」爲古今人所共同，來說明文學中有不帶階級性的分子，那方法其實是差不多的。在我自己，是以爲若據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於經濟」（也可以說根據於經濟組織或依存於經濟組織）之說，則這些就一定都帶着階級性。但是「都帶，」而非「只有。」所以不相信有一切超乎階級，文章如日月的永久的大文豪，也不相信住洋房，喝咖啡，卻道「唯我把握住了無產階級意識，所以我是真的無產者」的革命文學者。

有馬克斯學識的人來爲唯物史觀打仗，在此刻，我是不贊成的。我只希望有切實的人，肯譯幾部世界上已有定評的關於唯物史觀的書——至少是一部簡單淺顯的，兩部精密的——還要一兩本反對的著作。那麼，論爭起來，可以省說許多話。

魯迅。

八月十日。

一九二九年

「革命軍馬前卒」和「落伍者」

西湖博覽會上要設先烈博物館了，在徵求遺物。這是不可少的盛舉，沒有先烈，現在還拖着辮子也說不定的，更那能如此自在。

但所徵求的，末後又有「落伍者的醜史」，卻有些古怪了。仿佛要令人於飲水思源以後，再喝一口髒水，歷親芳烈之餘，添嗅一下臭氣似的。

而所徵求的「落伍者的醜史」的目錄中，又有「鄒容的事實」，那可更加有些古怪了。如果印本沒有錯而鄒容不是別人，那麼，據我所知道，大概是這樣的：

他在滿清時，做了一本革命軍，鼓吹排滿，所以自署曰「革命軍馬前卒鄒容」。後來從日本回國，在上海被捕，死在西牢裏了，其時蓋在一九〇二年。自然，他所主張的不過是

民族革命，未曾想到共和，自然更不知道三民主義，當然也不知道共產主義。但這是大家應該原諒他的，因為他死得太早了，他死了的明年，同盟會纔成立。

聽說中山先生的自敘上就提起他的，開目錄的諸公，何妨於公餘之暇，去查一查呢？
後烈實在前進得快，二十五年前的事，就已經茫然了，可謂美史也已。

（二月十七日。）

『近代世界短篇小說集』小引

一時代的紀念碑底的文章，文壇上不常有；即有之，也什九是大部的著作。以一篇短的小說而成爲時代精神所居的大宮闕者，是極其少見的。

但至今，在巍峨燦爛的巨大的紀念碑底的文學之旁，短篇小說也依然有着存在的充足的權利。不但巨細高低，相依爲命，也譬如身入大伽藍中，但見全體非常宏麗，眩人眼睛，令觀者心神飛越，而細看一雕闌一畫礎，雖然細小，所得卻更爲分明，再以此推及全體，感受遂愈加切實，因此那些終于爲人所注重了。

在現在的環境中，人們忙于生活，無暇來看長篇，自然也是短篇小說的繁生的很大原因之一。只頃刻間，而仍可藉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盡傳精神，用數頃刻，遂知種種作風，

種種作者，種種所寫的人和物和事狀，所得也頗不少的。而便捷，易成，取巧……這些原因還在。

中國于世界所有的大部傑作很少譯本，翻譯短篇小說的卻特別的多者，原因大約也爲此。我們——譯者的彙印這書，則原因就在此。貪圖用力少，紹介多，有些不肯用盡費氣力的壞處，是自問恐怕也在所不免的。但也有一點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會朽的腐草的。近于不壞的意思。還有，是要將零星的小品，聚在一本裏，可以較不容易于散亡。我們——譯者，都是一面學習，一面試做的人，雖于這一點小事，力量也還很不够，選的不當和譯的錯誤，想來是一定不免的。我們願受讀者和批評者的指正。

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朝花社同人識。

現今的新文學的概觀

——五月二十二日在燕京大學國文學會講——

這一年多，我不很向青年諸君說什麼話了，因為革命以來，言論的路很窄小，不是過激，便是反動，于大家都無益處。這一次回到北平，幾位舊識的人要我到這里來講幾句，情不可卻，只好來講幾句。但因為種種瑣事，終于沒有想定究竟來講什麼——連題目都沒有。

那題目，原是想在車上擬定的，但因為道路壞，汽車顛起來有尺多高，無從想起。我於是偶然感到，外來的東西，單取一件，是不行的，有汽車也須有好道路，一切事總免不掉環境的影響。文學——在中國的所謂新文學，所謂革命文學，也是如此。

中國的文化，便是怎樣的愛國者，恐怕也大概不能不承認是有些落後。新的事物，都是從外面侵入的。新的勢力來到了，大多數的人們還是莫名其妙。北平還不到這樣，譬如上海租界，那情形，外國人是處在中央，那外面，圍着一羣翻譯、包探、巡捕、西崽……之類，是懂得外國話，熟悉租界章程的。這一圈之外，纔是許多老百姓。

老百姓一到洋場，永遠不會明白真實情形，外國人說「Yes」，翻譯道：「他在說打一個耳光」，外國人說「No」，翻出來卻是他說「去鎗斃」。倘想要免去這一類無謂的冤苦，首先是在知道得多一點，衝破了這一個圈子。

在文學界也一樣，我們知道得太不多，而幫助我們知識的材料也太少。梁實秋有一個白璧德，徐志摩有一個泰戈爾，胡適之有一個杜威——是的，徐志摩還有一個曼殊，兒，他到她墳上去哭過，——創造社有革命文學，時行的文學。不過附和的，創作的很有研究的卻不多，直到現在，還是給幾個出題目的人們圍了起來。

各種文學，都是應環境而產生的，推崇文藝的人，雖喜歡說文藝足以煽起風波來，但在事實上，卻是政治先行，文藝後變。倘以為文藝可以改變環境，那是「唯心」之談，事實

的出現，並不如文學家所豫想。所以巨大的革命，以前的所謂革命文學者還須滅亡，待到革命略有結果，略有喘息的餘裕，這纔產生新的革命文學者。爲什麼呢，因爲舊社會將近崩壞之際，是常常會有近似帶革命性的文學作品出現的，然而其實並非真的革命文學。例如：或者憎惡舊社會，而只是憎惡，更沒有對於將來的理想；或者也大呼改造社會，而問他要怎樣的社會，卻是不能實現的烏託邦；或者自己活得無聊了，便空泛地希望一大轉變，來作刺戟，正如飽於飲食的人，想喫些辣椒爽口；更下的是原是舊式人物，但在社會裏失敗了，卻想另掛新招牌，靠新興勢力獲得更好的地位。

希望革命的文人，革命一到，反而沈默下去的例子，在中國便曾有過的。卽如清末的南社，便是鼓吹革命的文學團體，他們歎漢族的被壓制，憤滿人的凶橫，渴望着「光復舊物」。但民國成立以後，倒寂然無聲了。我想，這是因爲他們的理想，是在革命以後，「重見漢官威儀」，峨冠博帶。而事實並不這樣，所以反而索然無味，不想執筆了。俄國的例子尤爲明顯，十月革命開初，也曾有許多革命文學家非常驚喜，歡迎這暴風雨的襲來，願受風雷的試鍊。但後來，詩人葉遂寧，小說家索波里自殺了，近來還聽說有名的小說家愛倫堡

有些反動。這是什麼緣故呢？就因為四面襲來的並不是暴風雨，來試鍊的也並非風雷，卻是老老實實的『革命』。空想被擊碎了，人也就活不下去，這倒不如古時候相信死後靈魂上天，坐在上帝旁邊喫點心的詩人們福氣。因為他們在達到目的之前，已經死掉了。

中國，據說，自然是已經革了命，——政治上也許如此罷，但在文藝上，卻並沒有改變。有人說，『小資產階級文學之擡頭』了，其實是，小資產階級文學在那里呢，連『頭』也沒有，那里說得到『擡』。這照我上面所講的推論起來，就是文學並不變化和興旺，所反映的便是並無革命和進步，——雖然革命家聽了也許不大喜歡。

至于創造社所提倡的，更澈底的革命文學——無產階級文學，自然更不過是一個題目。這邊也禁，那邊也禁的，王獨清的從上海租界裏遙望廣州暴動的詩，『Pong Pong Pong』，鉛字逐漸大了起來，只在說明他曾為電影的字幕和上海的醬園招牌所感動，有模倣勃洛克的十二個之志而無其力和才。郭沫若的一隻手是很有人推為佳作的，但內容說一個革命者革命之後失了一隻手，所餘的一隻還能和愛人握手的事，卻未免『失』得太巧。五體、四肢之中，倘要失去其一，實在還不如一隻手，一條腿就不便，頭自然更不行。

了。只準備失去一隻手，是能減少戰鬥的勇往之氣的；我想，革命者所不惜犧牲的，一定不只這一點。一隻手也還是窮秀才落難，後來終於中狀元，諧花燭的老調。

但這些卻也正是中國現狀的一種反映。新近上海出版的革命文學的一本書的封面上，畫着一把鋼叉，這是從苦悶的象徵的書面上取來的，叉的中間的一條尖刺上，又安一個鐵鏈，這是從蘇聯的旗子上取來的。然而這樣地合了起來，卻弄得既不能刺，又不能敲，只能在表明這位作者的庸陋，——也可以做那些文藝家的徽章。

從這一階級走到那一階級去，自然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識如何，便一一直說，使大眾看去，為仇為友，了了分明。不要腦子裏存着許多舊的殘滓，卻故意瞞了起來，演戲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無產階級！』現在的人們既然神經過敏，聽到『俄』字便要氣絕，連嘴唇也快要不准紅了，對於出版物，這也怕，那也怕；而革命文學家又不肯多紹介別國的理論和作品，單是這樣的指着自己的鼻子，臨了便會像前清的『奉旨申斥』一樣，令人莫名其妙的。

對於諸君，『奉旨申斥』大概還須解釋幾句纔會明白罷。這是帝制時代的事。一個

官員犯了過失了，便叫他跪在一個什麼門外面，皇帝差一個太監來斥罵。這時須得用一點化費，那麼，罵幾句就完；倘若不用，他便從祖宗一直罵到子孫。這算是皇帝在罵，然而誰能去問皇帝，問他究竟可是要這樣地罵呢？去年，據日本的雜誌上說，成仿吾是由中國的農工大衆選他往德國研究戲曲去了，我們也無從打聽，究竟真是這樣地選了沒有。

所以我想，倘要比較地明白，還只好用我的老話，「多看外國書」來打破這包圍的圈子。這事，于諸君是不甚費力的。關於新興文學的英文書或英譯書，即使不多，然而所有的幾本，一定較為切實可靠。多看些別國的理論和作品之後，再來估量中國的新文藝，便可以清楚得多了。更好是介紹到中國來；翻譯並不比隨便的創作容易，然而于新文學的發展卻更有功，于大家更有益。

『皇漢醫學』

革命成功之後，『國術』『國技』『國花』『國醫』鬧得烏煙瘴氣之時，日本人湯本求真做的皇漢醫學譯本也將乘時出版了。廣告上這樣說——

『日醫湯本求真氏於明治三十四年卒業金澤醫學專門學校後應世多年覺中西醫術各有所長短非比較同異捨短取長不可爰發憤學漢醫歷十八年之久彙集吾國歷來諸家醫書及彼邦人士研究漢醫藥心得之作著「皇漢醫學」一書引用書目多至一百餘種旁求博考洵大觀也……』

我們『皇漢』人實在有些怪脾氣的：外國人論及我們缺點的不欲聞，說好處就相信，講科學者不大提，有幾個說神見鬼的便紹介。這也正是同例，金澤醫學專門學校卒業

者何止數千人，做西洋醫學的也有十幾位了，然而我們偏偏刮目於可入無雙譜的湯本先生的皇漢醫學。

小朋友梵兒在日本東京，化了四角錢在地攤上買到一部岡千仞作的觀光紀游，是明治十七年（一八八四）來游中國的日記。他看過之後，在書頭卷尾寫了幾句牢騷話，寄給我了。來得正好，鈔一段在下面——

「二十三日，夢香、竹孫來訪……夢香盛稱多紀氏醫書。余曰：「敵邦西洋醫學盛開，無復手多紀氏書者，故販原板上海書肆，無用陳餘之芻狗也。」曰：「多紀氏書，發仲景氏微旨，他年日人必悔此事。」曰：「敵邦醫術大開，譯書續出，十年之後，中人爭購敵邦譯書，亦不可知。」夢香默然。余因以爲合信氏醫書（案：蓋指全體新論，）刻于寧波，寧波距此咫尺，而夢香滿口稱多紀氏，無一語及合信氏者，何故也……」（卷三蘇杭日記下二頁）

岡氏於此等處似乎終於不明白。這是「四千餘年古國古」的人民的「收買廢銅爛鐵」脾氣，所以文人則「盛稱多紀氏」，武人便大買舊磁和廢鎗，給外國「無用陳餘

之芻狗」有一條出路。

岡氏距明治維新後不久，還有改革的英氣，所以他的日記裏常有好意的苦言。革命底批評家或云與其看世紀末的頹瑣隱晦沒奈何之言，不如上觀任何民族開國時文字，證以此事，是頗有一理的。

（七月二十八日。）

「吾國征俄戰史之一頁」

大家都說要打俄國，或者「願爲前驅」，或者「願作後盾」，連中國文學所賴以不墜的新月書店，也登廣告出賣關於俄國的書籍兩種，則舉國之同仇敵愾也可知矣。自然大勢如此，執筆者也應當做點應時的東西，庶幾不至於落伍。我于是在七月廿六日新聞報的快活林裏，遇見一篇題作吾國征俄戰史之一頁的敘述詳細而昏不可當的文章，可惜限於篇幅，只能摘抄——

「……迺嘗讀史至元成吉思汗起自蒙古。入主中夏。開國以後。奄有欽察阿速諸部。命速不台征蔑里吉。復引兵繞寬田吉思海。轉戰至太和嶺。洎太宗七年。又命速不台爲前驅。隨諸王拔都。皇子貴由。皇姪哥等伐西域。十年乃大舉征俄。

直逼耶烈贊城。而陷莫斯科。太祖長子求赤遂於其地即可汗位。可謂破前古未有之紀載矣。夫一代之英主。開創之際。戰勝攻取。用其兵威。不難統一區宇。史冊所敘。縱極鋪張。要不過禹域以內。訖無西至流沙。舉朔北遼絕之地而空之。不特唯是。猶復鼓其餘勇。進逼歐洲內地。而有歐亞混一之勢者。謂非吾國戰史上最
有光彩最有榮譽之一頁得乎……」

那結論是——

「……實言之。元時之兵鋒。不僅足以扼歐亞之吭。而有席捲包舉之氣象。有足以壯吾國後人之勇氣者。固自有在。余故備述之。以告應付時局而固邊圉者。」

這只有這作者清耀先生是蒙古人，倒還說得過去。否則，成吉思汗「入主中夏」亦在莫斯科「即可汗位」，那時咱們中俄兩國的境遇正一樣，就是都被蒙古人征服的。爲什麼中國人現在竟來硬霸「元人」爲自己的先人，彷彿滿臉光彩似的，去驕傲同受壓迫的斯拉夫種的呢？

倘照這樣的論法，俄國人就可以作「吾國征華史之一頁」，說他們在元代奄有中國的版圖。

倘照這樣的論法，則即使俄人此刻「入主中夏」也就有「歐亞混一之勢」，「有足以壯吾國後人」之後人「之勇氣者」矣。

嗟乎，赤俄未征，白癡已出，殊「非吾國戰史上最有光彩最有榮譽之一頁」也。

（七月二十八日。）

葉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

這是一個青年的作者，以一個現代的活的青年爲主角，描寫他十年中的行動和思想的書。

舊的傳統和新的思潮，紛紜於他的一身，愛和憎的糾纏，感情和理智的衝突，纏綿和決撒的迭代，歡欣和絕望的起伏，都逐着這小小十年而開展，以形成一部感傷的書，個人的書。但時代是現代，所以從舊家庭所希望的「上進」而渡到革命，從交通不大方便的小縣而渡到「革命策源地」的廣州，從本身的婚姻不自由而渡到偉大的社會改革——但我沒有發見其間的橋梁。

一個革命者，將——而且實在也已經（！）——爲大眾的幸福鬪爭，然而獨獨寬恕

首先壓迫自己的親人，將鎗口移向四面是敵，但又四不見敵的舊社會；一個革命者，將爲人我爭解放，然而當失去愛人的時候，卻希望她自己負責，並且爲了革命之故，不願自己有一個情敵——志願愈大，希望愈高，可以致力之處就愈少，可以自解之處也愈多——終于，則甚至閃出了惟本身目前的刹那間爲惟一的現實一流的陰影。在這里，是屹然站着一個個人主義者，遙望着集團主義的大纛，但在「重上征途」之前，我沒有發見其間的橋梁。

釋迦牟尼出世以後，割肉喂鷹，投身飼虎的是小乘，渺渺茫茫地說教的倒算是大乘，總是發達起來，我想，那機微就在此。

然而這書的生命，卻正在這里。他描出了背着傳統，又爲世界思潮所激盪的一部分的青年的心，逐漸寫來，並無遮瞞，也不裝點，雖然間或有若干辯解，而這些辯解，卻又正是脫去了自己的衣裳。至少，將爲現在作一面明鏡，爲將來留一種記錄，是無疑的罷。多少偉大的招牌，去年以來，在文攤上都掛過了，但不到一年，便以變相和無物，自己告發了全盤的欺騙，中國如果還會有文藝，當然先要以這樣直說自己所本有的內容的著作，來打退

騙局以後的空虛。因爲文藝家至少是須有直抒己見的誠心和勇氣的，倘不肯吐露本心，就更談不到什麼意識。

我覺得最有意義的是漸向戰場的一段，無論意識如何，總之，許多青年，從東江起，而上海，而武漢，而江西，爲革命戰鬪了，其中的一部分，是抱着種種的希望，死在戰場上，再看不見上面擺起來的是金交椅呢還是虎皮交椅。種種革命，便都是這樣地進行，所以掉弄筆墨的，從實行者看來，究竟還是閒人之業。

這部書的成就，是由於曾經革命而沒有死的青年。我想，活着，而又在看小說的人們，常有許多人發生同感。

技術，是未曾矯揉造作的。因爲事情是按年敘述的，所以文章也傾瀉而下，至使作者在後記裏，不願稱之爲小說，但也自然是小說。我所感到累贅的只是說理之處過于多，校讀時刪節了一點，倘使反而損傷原作了，那便成了校者的責任。還有好像缺點而其實是優長之處，是語彙的不豐，新文學興起以來，未忘積習而常用成語如我的和故意作怪而亂用誰也不懂的生語如創造社一流的文字，都使文藝和大衆隔離，這部書卻加以掃蕩

了，使讀者可以更易于了解，然而從中作梗的還有許多新名詞。

通讀了這部書，已經在一月之前了，因為不得不寫幾句，便憑着現在所記得的寫了這些字。我不是什麼社的內定的「鬪爭」的「批評家」之一員，只能直說自己所願意說的話。我極欣幸能紹介這真實的作品于中國，還渴望看見「重上征途」以後之作的
新吐的光芒。

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八日，於上海，魯迅記。

柔石作「二月」小引

衝鋒的戰士，天真的孤兒，年青的寡婦，熱情的女人，各有主義的新式公子們，死氣沈沈而交頭接耳的舊社會，倒也並非如蜘蛛張網，專一在待飛翔的游人，但在尋求安靜的青年的眼中，卻化爲不安的大苦痛，這大苦痛，便是社會的可憐的椒鹽，和戰士孤兒等輩一同，給無聊的社會一些味道，使他們無聊地持續下去。

濁浪在拍岸，站在山崗上者和飛沫不相干，弄潮兒則于濤頭且不在意，惟有衣履尙整，徘徊海濱的人，一濺水花，便覺得有所沾溼，狼狽起來。這從上述的兩類人們看來，是都覺得詫異的。但我們書中的青年蕭君，便正落在這境遇裏。他極想有爲，懷着熱愛，而有所顧惜，過于矜持，終于連安住幾年之處，也不可得。他其實並不能成爲一小齒輪，跟着大齒

輪轉動，他僅是外來的一粒石子，所以軋了幾下，發幾聲響，便被擠到女佛山——上海去了。

他幸而還堅硬，沒有變成潤澤齒輪的油。

但是，嬰曇（釋迦牟尼）從夜半醒來，目覩宮女們睡態之醜，於是慨然出家，而霍善斯坦因為是醉飽後的嘔吐。那麼，蕭君的決心遁走，恐怕是胃弱而禁食的了，雖然我還無從明白其前因，是由于氣質的本然，還是戰後的暫時的勞頓。

我從作者用了工妙的技術所寫成的草稿上，看見了近代青年中這樣的一種典型，周遭的人物，也都生動，便寫下一些印象，算是序文。大概明敏的讀者，所得必當更多于我，而且由讀時所生的詫異或同感，照見自己的態度的罷？那實在是很有意義的。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日，魯迅記於上海。

流氓的變遷

孔墨都不滿於現狀，要加以改革，但那第一步，是在說動人主，而那用以壓服人主的傢伙，則都是「天」。

孔子之徒爲儒，墨子之徒爲俠。「儒者，柔也，」當然不會危險的。惟俠老實，所以墨者的末流，至于以「死」爲終極的目的。到後來，真老實的逐漸死完，止留下取巧的俠，漢的大俠，就已和公侯權貴相餽贈，以備危急時來作護符之用了。

司馬遷說：「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亂」之和「犯，」決不是「叛，」不過鬧點小亂子而已，而況有權貴如「五侯」者在。

「俠」字漸消，強盜起了，但也是俠之流，他們的旗幟是「替天行道。」他們所反對

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們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將相。李逵劫法場時，掄起板斧來排頭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于是奴才。

滿洲入關，中國漸被壓服了，連有「俠氣」的人，也不敢再起盜心，不敢指斥奸臣，不敢直接為天子效力，於是跟一個好官員或欽差大臣，給他保鑣，替他捕盜，一部施公案，也說得很分明，還有彭公案、七俠五義之流，至今沒有窮盡。他們出身清白，連先前也並無壞處，雖在欽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對一方面固然必須聽命，對別方面還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

然而為盜要被官兵所打，捕盜也要被強盜所打，要十分安全的俠客，是覺得都不安當的，於是有流氓。和尚喝酒他來打，男女通姦他來捉，私娼私販他來凌辱，為的是維持風化；鄉下人不懂租界章程他來欺侮，為的是看不起無知，剪髮女人他來嘲罵，社會改革者他來憎惡，為的是寶愛秩序。但後面是傳統的靠山，對手又都非浩蕩的強敵，他就在其間橫行過去。現在的小說，還沒有寫出這一種典型的書，惟九尾龜中的章秋谷，以為他給妓

女喫苦，是因為她要敲人們竹槓，所以給以懲罰之類的敘述，約略近之。

由現狀再降下去，大概這一流人將成爲文藝書中的主角了，我在等候「革命文學家」張資平「氏」的近作。

新月社批評家的任務

新月社中的批評家，是很憎惡嘲罵的，但只嘲罵一種人，是做嘲罵文章者。新月社中的批評家，是很不以不滿于現狀的人爲然的，但只不滿于一種現狀，是現在竟有不滿于現狀者。

這大約就是「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揮淚以維持治安的意思。

譬如，殺人，是不行的。但殺掉「殺人犯」的人，雖然同是殺人，又誰能說他錯打[？]人，也不行的。但大老爺要打鬪毆犯人的屁股時，皂隸來一五一十的打，難道也算犯罪麼？[？]新月社批評家雖然也有嘲罵，也有不滿，而獨能超然於嘲罵和不滿的罪惡之外者，我以爲就是這一個道理。

但老例，劊子手和皂隸既然做了這樣維持治安的任務，在社會上自然要得到幾分的敬畏，甚至於還不妨隨意說幾句話，在小百姓面前顯顯威風，只要不大妨害治安，長官向來也就裝作不知道了。

現在新社會的批評家這樣盡力地維持了治安，所要的卻不過是「思想自由」，想想而已，決不實現的思想。而不料遇到了別一種維持治安法，竟連想也不准想了。從此以後，恐怕要不滿于兩種現狀了罷。

書籍和財色

今年在上海所見，專以小孩子爲對手的糖擔，十有九帶了賭博性了，用一個銅元，經一種手續，可有得到一個銅元以上的糖的希望。但專以學生爲對手的書店，所給的希望卻更其大，更其多——因爲那對手是學生的緣故。

書籍用實價，廢去「碼洋」的陋習，是始於北京的新潮社——北新書局的，後來上海也多仿行，蓋那時改革潮流正盛，以爲買賣兩方面，都是志在改進的人（書店之以介紹文化者自居，至今還時見于廣告上），正不必先定虛價，再打折扣，玩些互相欺騙的把戲。然而將麻雀牌送給世界，且以此自豪的人民，對於這樣簡捷了當，沒有意外之利的辦法，是終于耐不下去的。于是老病出現了，先是小試其技：送畫片。繼而打折扣，自九折以至

對折，但自然又不是舊法，因為總有一個定期和原因，或者因為學校開學，或者因為本店開張一年半的紀念之類。花色一點的還有贈絲襪，請喫冰淇淋，附送一隻錦盒，內藏十件寶貝，價值不貲。更加見得切實，然而確是驚人的，是定一年報或買幾本書，便有得到「勸學獎金」一百元或「留學經費」二千元的希望。洋場上的「輪盤賭」付給贏家的錢，最多也不過每一元付了三十六元，真不如買書，那「希望」之大，遠甚遠甚。

我們的古人有言，「書中自有黃金屋」，現在漸在實現了。但後一句，「書中自有顏如玉」呢？

日報所附送的畫報上，不知爲了什麼緣故而登載的什麼「女校高材生」和什麼「女士在樹下讀書」的照相之類，且作別論，則買書一元，贈送裸體畫片的勾當，是應該舉爲帶着「顏如玉」氣味的一例的了。在醫學上，「婦人科」雖然設有專科，但在文藝上，「女作家」分爲一類，卻未免濫用了體質的差別，令人覺得有些特別的。但最露骨的是張競生博士所開的美的書店，曾經對面獸站着兩個年青臉白的女店員，給買主可以問她「第三種水」出了沒有？」等類，一舉兩得，有玉有書。可惜美的書店竟遭禁止。張

博士也改絃易轍，去譯盧騷懺悔錄，此道遂有中衰之歎了。

書籍的銷路如果再消沈下去，我想，最好是用女店員賣女作家的作品及照片，仍然抽彩，給買主又有得到「勸學」，「留學」的款子的希望。

我和「語絲」的始終

同我關係較爲長久的，要算語絲了。

大約這也是原因之一罷，「正人君子」們的刊物，曾封我爲「語絲派主將」，連急進的青年所做的文章，至今還說我是語絲的「指導者」。去年，非罵魯迅便不足以自救其沒落的時候，我曾蒙匿名氏寄給我兩本中塗的山雨，打開一看，其中有一篇短文，大意是說我和孫伏園君在北京因被晨報館所壓迫，創辦語絲，現在自己一做編輯，便在投稿後面亂加按語，曲解原意，壓迫別的作者了，孫伏園君卻有絕好的議論，所以此後魯迅應該聽命於伏園。這聽說是張孟聞先生的大文，雖然署名是另外兩個字。看來好像一羣人，其實不過一兩個，這種事現在是常有約。

自然，「主將」和「指導者」並不是壞稱呼，被晨報館所壓迫，也不能算是恥辱，老人該受青年的教訓，更是進步的好現象，還有什麼話可說呢？但是，「不虞之譽」也和「不虞之毀」一樣地無聊，如果生平未曾帶過一兵半卒，而有人拱手頌揚道，「你真像拿破崙呀！」則雖是志在做軍閥的未來的英雄，也不會怎樣舒服的。我並非「主將」的事，前年早已聲辯了——雖然似乎很少效力——這回想要寫一點下來的，是我從來沒有受過晨報館的壓迫，也並不是和孫伏園先生兩個人創辦了語絲。這的創辦，倒要歸功於伏園一位的。

那時伏園是晨報副刊的編輯，我是由他個人來約，投些稿件的人。

然而我並沒有什麼稿件，於是就有人傳說，我是特約撰述，無論投稿多少，每月總有酬金三四十元的。據我所聞，則晨報館確有這一種太上作者，但我並非其中之一，不過因為先前的師生——恕我僭妄，暫用這兩個字——關係罷，似乎也頗受優待：一是稿子一去，刊登得快；二是每千字二元至三元的稿費，每月底大抵可以取到；三是短短的雜評，有時也送些稿費來。但這樣的好景象並不久長，伏園的椅子頗有不穩之勢。因為有一位留

學生（不幸我忘掉了他的名姓）新從歐洲回來，和晨報館有深關係，甚不滿意於副刊，決計加以改革，並且爲戰鬪計，已經得了『學者』的指示，在開手看 Anatole France 的小說了。

那時的法蘭斯、威爾士、蕭，在中國是大有威力，足以嚇倒文學青年的名字，正如今年的辛克萊兒一般，所以以那時而論，形勢實在是已經非常嚴重。不過我現在無從確說，從那位留學生開手讀法蘭斯的小說起到伏園氣忿忿地跑到我的寓裏來爲止的時候，其間相距是幾月還是幾天。

「我辭職了。可惡！」

這是有一夜，伏園來訪，見面後的第一句話。那原是意料中事，不足異的。第二步，我當然要問問辭職的原因，而不料竟和我有了關係。他說，那位留學生乘他外出時，到排字房去將我的稿子抽掉，因此爭執起來，弄到非辭職不可了。但我並不氣忿，因爲那稿子不過是三段打油詩，題作我的失戀，是看見當時「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類的失戀詩盛行，故意做一首用「由她去罷」收場的東西，開開玩笑的。這詩後來又添了一段，登在語絲

上，再後來就收在野草中。而且所用的又是另一個新鮮的假名，在不肯登載第一次看見姓名的作者的稿子的刊物上，也當然很容易被有權者所放逐的。

但我很抱歉伏園爲了我的稿子而辭職，心上似乎壓了一塊沈重的石頭。幾天之後，他提議要自辦刊物了，我自然答應願意竭力「吶喊」。至于投稿者，倒全是他獨力邀來的，記得是十六人，不過後來也並非都有投稿。於是印了廣告，到各處張貼，分散，大約又一星期，一張小小的週刊便在北京——尤其是大學附近——出現了。這便是語絲。

那名目的來源，聽說，是有幾個人任意取一本書，將書任意翻開，用指頭點下去，那被點到的字，便是名稱。那時我不在場，不知道所用是什麼書，是一次便得了語絲的名，還是點了好幾次，而會將不像名稱的廢去。但要之，即此已可知這刊物本無所謂一定的目標，統一的戰綫；那十六個投稿者，意見態度也各不相同，例如顧頡剛教授，投的便是「考古」稿子，不如說，和語絲的喜歡涉及現在社會者，倒是相反的。不過有些人們，大約開初是只在敷衍和伏園的交情的罷，所以投了兩三回稿，便取「敬而遠之」的態度，自然難免連伏園自己，據我的記憶，自始至今，也只做過三回文字，末一回是宣言從此要大爲語

絲撰述，然而宣言之後，卻連一個字也不見了。於是語絲的固定的投稿者，至多便只剩了五六人，但同時也在不意中顯了一種特色，是任意而談，無所顧忌，要催促新的產生，對於有害于新的舊物，則竭力加以排擊，——但應該產生怎樣的「新」，卻並無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覺得有些危急之際，也還是故意隱約其詞。陳源教授痛斥「語絲派」的時候，說我們不敢直罵軍閥，而偏和握筆的名人為難，便由于這一點。但是，叱吧兒狗險於叱狗主人，我們其實也知道，所以隱約其詞者，不過要使走狗嗅得跑去獻功時，必須詳加說明，比較地費些力氣，不能直捷痛快，就得好處而已。

當開辦之際，努力確也可驚，那時做事的，伏園之外，我記得還有小峯和川島，都是乳毛還未褪盡的青年，自跑印刷局，自去校對，自疊報紙，還自己拿到大衆聚集之處去兜售，這真是青年對於老人，學生對於先生的教訓，令人覺得自己只用一點思索，寫幾句文章，未免過于安逸，還須竭力學好了。

但自己賣報的成績，聽說並不佳，一紙風行的，還是在幾個學校，尤其是北京大學，尤其是第一院（文科）理科次之。在法科，則不大有人顧問。倘若說，北京大學的法政、經濟

科出身諸君中，絕少有語絲的影響，恐怕是不會很錯的。至于對於晨報的影響，我不知道，但似乎也頗受些打擊，曾經和伏園來說和，伏園得意之餘，忘其所以，曾以勝利者的笑容，笑着對我說道：

「真好，他們竟不料踏在炸藥上了！」

這話對別人說是不算什麼的。但對我說，卻好像澆了一碗冷水，因為我即刻覺得這「炸藥」是指我而言，用思索，做文章，都不過使自己為別人的一個小糾葛而粉身碎骨，心裏就一面想：

「真糟，我竟不料被埋在地下了！」

我於是乎「彷徨」起來。

譚正璧先生有一句用我的小說的名目來批評我的作品的經過的極伶俐，而省事的話道：「魯迅始於「吶喊」而終於「彷徨」」（大意）我以為移來敘述我和語絲由始以至此時的歷史，倒是很確切的。

但我的「彷徨」並不用許多時，因為那時還有一點讀過尼采的“Zarathustra”

的餘波，從我這里只要能擠出——雖然不過是擠出——文章來，就擠了去罷，從我這里只要能做出一點「炸藥」來，就拿去做了罷，於是也就決定，還是照舊投稿了——雖然對於意外的被利用，心裏也耿耿了好幾天。

語絲的銷路可只是增加起來，原定是撰稿者同時負擔印費的，我付了十元之後，就不見再來收取了，因為收支已足相抵，後來並且有了贏餘。于是小峯就被尊為「老板」，但這推尊並非美意，其時伏園已另就京報副刊編輯之職，川島還是搗亂小孩，所以幾個撰稿者便只好辭住了多睜眼而少開口的小峯，加以榮名，勒令拿出贏餘來，每月請一回客。這「將欲取之，必先與之」的方法果然奏效，從此市場中的茶居或飯鋪的或一房門外，有時便會看見掛着一塊上寫語絲社的木牌。倘一駐足，也許就可以聽到疑古玄同先生的又快又響的談吐。但我那時是在避開宴會的，所以毫不知道內部的情形。

我和語絲的淵源和關係，就不過如此，雖然投稿時多時少。但這樣地一直繼續到我走出了北京。到那時候，我還不知道實際上是誰的編輯。

到得廈門，我投稿就很少了。一者因為相離已遠，不受催促，責任便覺得輕；二者因為

人地生疏，學校裏所遇到的又大抵是些念佛老嫗式口角，不值得費紙墨。倘能做魯賓孫教書記或蚊蟲叮卵脬論，那也許倒很有趣的，而我又沒有這樣的「天才」，所以只寄了一點極瑣碎的文字。這年底到了廣州，投稿也很少。第一原因是和在廈門相同的；第二，先是忙于事務，又看不清那里的情形，後來頗有感慨了，然而我不想在他的敵人的治下去發表。

不願意在有權者的刀下，頌揚他的威權，并奚落其敵人來取媚可以說，也是「語絲派」一種幾乎共同的態度。所以語絲在北京雖然逃過了段祺瑞及其吧兒狗們的撕裂，但終究被「張大元帥」所禁止了，發行的北新書局，且同時遭了封禁，其時是一九二六年。

這一年，小峯有一回到我的上海的寓居，提議語絲就要在上海印行，且囑我擔任做編輯。以關係而論，我是不應該推託的。于是擔任了。從這時起，我纔探問向來的編法。那很簡單，就是：凡社員的稿件，編輯者並無取捨之權，來則必用，只有外來的投稿，由編輯者略加選擇，必要時且或略有所刪除。所以我應做的，不過後一段事，而且社員的稿子，實際上

也十之九直寄北新書局，由那里逕送印刷局的，等到我看見時，已在印釘成書之後了。所謂「社員」也並無明確的界限，最初的撰稿者，所餘早已無多，中途出現的人，則在中途忽來忽去。因為語絲是又有愛登碰壁人物的牢騷的習氣的，所以最初出陣，尙無用武之地的人，或本在別一團體，而發生意見，借此反攻的人，也每和語絲暫時發生關係，待到功成名遂，當然也就淡漠起來。至于因環境改變，意見分歧而去的，那自然尤為不少。因此所謂「社員」者，便不能有明確的界限。前年的方法，是只要投稿幾次，無不刊載，此後便放心發稿，和舊社員一律待遇了。但經舊的社員紹介，直接交到北新書局，刊出之前，為編輯者的眼睛所不能見者，也間或有之。

經我擔任了編輯之後，語絲的時運就很不濟了，受了一回政府的警告，遭了浙江當局的禁止，還招了創造社式「革命文學」家的拚命的圍攻。警告的來由，我莫名其妙，有人說是因為一篇戲劇；禁止的緣故也莫名其妙，有人說是因為登載了揭發復旦大學內幕的文字，而那時浙江的黨務指導委員老爺卻有復旦大學出身的人們。至于創造社派的攻擊，那是屬於歷史底的了，他們在把守「藝術之宮」，還未「革命」的時候，就已經

將「語絲派」中的幾個人看作眼中釘的，敘事夾在這裏太冗長了，且待下一回再說罷。

但語絲本身，卻確實也在消沈下去。一是對於社會現象的批評幾乎絕無，連這一類的投稿也少有，二是所餘的幾個較久的撰稿者，這時又少了幾個了。前者的原因，我以為是在無話可說，或有話而不敢言，警告和禁止，就是一個實證。後者，我恐怕是其咎在我的舉一點例罷，自然我萬不得已，選登了一篇極平和的糾正劉半農先生的「林則徐被伴」之誤的來信以後，他就不再有了片紙隻字；江紹原先生紹介了一篇油印的馮玉祥先生：來，我不給編入之後，紹原先生也就從此沒有投稿了。並且這篇油印文章不久便在也是伏園所辦的貢獻上登出，上有鄭重的小序，說明着我託辭不載的事由單。

還有一種顯著的變遷是廣告的雜亂。看廣告的種類，大概是就可以推見這刊物的性質的。例如「正人君子」們所辦的現代評論上，就會有金城銀行的長期廣告，南洋華僑學生所辦的秋野上，就能見「虎標良藥」的招牌。雖是打着「革命文學」旗子的小報，只要有那上面的廣告大半是花柳藥和飲食店，便知道作者和讀者，仍然和先前的專講妓女戲子的小報的人們同流，現在不過用男作家、女作家來替代了倡優，或捧或罵，算

是在文壇上做工夫。語絲初辦的時候，對於廣告的選擇是極嚴的，雖是新書，倘社員以爲不是好書，也不給登載。因爲是同人雜誌，所以撰稿者也可行使這樣的職權。聽說北新書局之辦北新半月刊，就因爲在語絲上不能自由登載廣告的緣故。但自從移在上海出版以後，書籍不必說，連醫生的診例也出現了，機廠的廣告也出現了，甚至于立愈遺精藥品廣告也出現了。固然，誰也不能保證語絲的讀者決不遺精，況且遺精也並非惡行，但善後辦法，卻須向申報之類，要穩當，則向醫學報的廣告上去留心的。我因此得了幾封詰責的信件，又就在語絲本身上登了一篇投來的反對的文章。

但以前我也曾盡了我的本分。當機廠出現時，曾經當面質問過小峯，回答是「發廣告的人弄錯的」；遺精藥出現時，是寫了一封信，並無答覆，但從此以後，廣告卻也不見了。我想，在小峯大約還要算是讓步的，因爲這時對於一部分的作家，早由北新書局致送稿費，不只負發行之責，而語絲也因此並非純粹的同人雜誌了。

積了半年的經驗之後，我就決計向小峯提議，將語絲停刊，沒有得到贊成，我便辭去編輯的責任。小峯要我尋一個替代的人，我於是推舉了柔石。

但不知爲什麼，柔石編輯了六個月，第五卷的上半卷一完，也辭職了。

以上是我所遇見的關於語絲四年中的瑣事。試將前幾期和近幾期一比較，便知道其間的變化，有怎樣的不同，最分明的是幾乎不提時事，且多登中篇作品了，這是因爲容易充滿頁數而又可免於遭殃。雖然因爲毀壞舊物和戳破新盒子而露出裏面所藏的舊物來的一種突擊之力，至今尙爲舊的和自以爲新的人們所憎惡，但這力是屬於往昔的了。

(十二月二十二日。)

魯迅譯著書目

一九二一年

工人綏惠略夫（俄國M·阿爾志跋綏夫中篇小說。商務印書館印行文學研究會叢書之一，後歸北新書局，爲未名叢刊之一，今絕版。）

一九二二年

一個青年的夢（日本武者小路實篤作戲曲。商務印書館印行文學研究會叢書之一，後歸北新書局，爲未名叢刊之一，今絕版。）

愛羅先珂童話集（商務印書館印行文學研究會叢書之一。）

一九二三年

桃色的雲（俄國 V·愛羅先珂作童話劇。北新書局印行未名叢刊之一。）

吶喊（短篇小說集，一九一八至二二年作，共十四篇。印行所同上。）

中國小說史略上冊（改訂之北京大學文科講義。印行所同上。）

一九二四年

苦悶的象徵（日本廚川白村作論文。北新書局印行未名叢刊之一。）

中國小說史略下冊（印行所同上。後合上冊爲一本。）

一九二五年

熱風（一九一八至二四年的短評。印行所同上。）

一九二六年

彷徨（短篇小說集之二，一九二四至二五年作，共十一篇。印行所同上。）

華蓋集（短評集之二，皆一九二五年作。印行所同上。）

華蓋集續編（短評集之三，皆一九二六年作。印行所同上。）

小說舊聞鈔（輯錄舊文，間有考正。印行所同上。）

出了象牙之塔（日本厨川白村作隨筆，選譯。未名社印行未名叢刊之一，今歸北新

書局。）

一九二七年

墳（一九〇七至二五年的論文及隨筆。未名社印行。今版被抵押，不能印。）

朝華夕拾（回憶文十篇。未名社印行未名新集之一。今版被抵押，由北新書局另排印行。）

唐宋傳奇集十卷（輯錄并考正。北新書局印行。）

一九二八年

小約翰（丹麥F·望·藹覃作長篇童話。未名社印行未名叢書之一。今版被抵押，不能印。）

野草（散文小詩。北新書局印行。）

而已集（短評集之四，皆一九二七年作。印行所同上。）

思想山水人物（日本鶴見祐輔作隨筆，選譯。印行所同上，今絕版。）

一九二九年

壁下譯叢（譯俄國及日本作家與批評家之論文集。印行所同上。）

近代美術史潮論（日本板垣鷹穂作。印行所同上。）

露谷虹兒畫選（并譯題詞。朝華社印行藝苑朝華之一，今絕版。）

無產階級文學的理論與實際（日本片上伸作。大江書店印行文藝理論小叢書之

一。）

藝術論（蘇聯A·盧那卡爾斯基作。印行所同上。）

一九三〇年

藝術論（俄國G·蒲力汗諾夫作。光華書局印行科學的藝術論叢書之一。）

文藝與批評（蘇聯盧那卡爾斯基作論文及演說。水沫書店印行同叢書之一。）

文藝政策（蘇聯關於文藝的會議錄及決議。並同上。）

十月（蘇聯A·雅各武萊夫作長篇小說。神州國光社收稿爲現代文藝叢書之一，

今尙未印。）

一九三一年

藥用植物（日本刈米達夫作。商務印書館收稿，分載自然界中。）

毀滅（蘇聯A·法捷耶夫作長篇小說。三開書屋印行。）

譯著之外，又有所校勘者，爲：

唐劉恂嶺表錄異三卷（以唐、宋類書所引校永樂大典本，并補遺。未印。）
魏中散大夫嵇康集十卷（校明叢書堂鈔本，并補遺。未印。）

所纂輯者，爲：

古小說鈞沈三十六卷（輯周至隋散逸小說。未印。）
謝承後漢書輯本五卷（多于汪文臺輯本，未印。）

所編輯者，爲：

莽原（週刊。北京京報附送，後停刊。）

語絲（週刊。所編爲在北平被禁，移至上海出版後之第四卷至第五卷之半。北新書

局印行，後廢刊。）

奔流（自一卷一冊起，至二卷五冊停刊。北新書局印行。）

文藝研究（季刊。只出第一冊。大江書店印行。）

所選定，校字者，爲：

故鄉（許欽文作短篇小說集。北新書局印行。烏合叢書之一。）

心的探險（長虹作雜文集。同上。）

飄渺的夢（向培良作短篇小說集。同上。）

忘川之水（眞吾詩選。北新書局印行。）

所校訂，校字者，爲：

蘇俄之文藝論戰（蘇聯褚沙克等論文，附蒲力汗諾夫與藝術問題，任國楨譯。北新

書局印行。未名叢書之一。）

十二個（蘇聯 A·勃洛克作長詩，胡駿譯。同上。）

爭自由的波浪（俄國 V·但兼珂等作短篇小說集，董秋芳譯。同上。）

勇敢的約翰（匈牙利裴多菲·山大作民間故事詩，孫用譯。湖風書局印行。）

夏娃日記（美國馬克·士溫作小說，李蘭譯。湖風書局印行。世界文學名著譯叢之

1）

所校訂者，爲：

二月（柔石作中篇小說。朝華社印行，今絕版。）

小小十年（葉永蓀作長篇小說。春潮書局印行。）

窮人（俄國 F·陀思妥夫斯基本作小說，章叢燕譯。未名社印行。未名叢書之一。）

黑假面人（俄國 L·安特來夫作戲曲，李霽野譯。同上。）

紅笑（前人作小說，梅川譯。商務印書館印行。）

小彼得（匈牙利 H·至爾·妙倫作童話，許霞譯。朝華社印行，今絕版。）

進化與退化（周建人所譯生物學的論文選集。光華書局印行。）

浮士德與城（蘇聯A·盧那卡爾斯基作戲曲，柔石譯。神州國光社印行現代文藝叢書之一。）

叢書之一。

靜靜的頓河（蘇聯M·唆羅訶夫作長篇小說，第一卷，賀非譯。同上。）

鐵甲列車第一四——六九（蘇聯V·伊凡諾夫作小說，侍桁譯。同上，未出。）

所印行者，爲：

士敏土之圖（德國C·梅斐爾德木刻十幅。珂羅版印。）

鐵流（蘇聯A·綏拉菲摩維支作長篇小說，曹靖華譯。）

鐵流之圖（蘇聯I·畢斯凱萊夫木刻四幅。印刷中，被炸燬。）

我所譯著的書，景宋曾經給我開過一個目錄，載在關於魯迅及其著作裏，但是並不完全的。這回因為開手編集雜感，打開了裝着和我有關的書籍的書箱，就順便另抄了一張書目，如上。

我還要將這附在三閒集的末尾。這目的是爲着自己，也有些爲着別人。據書目察核起來，我在過去的近十年中，費去的力氣實在也不少，即使校對別人的譯著，也真是一個字一個字的看下去，決不肯隨便放過，敷衍作者和讀者的，並且毫不懷着有所利用的意思。雖說做這些事，原因在於『有閒』，但我那時卻每日必須將八小時爲生活而出賣，用在譯作和校對上的，全是此外的工夫，常常整天沒有休息。倒是近四五年沒有先前那麼起勁了。

但這些陸續用去了的生命，實不只成爲徒勞，據有些批評家言，倒都是應該從嚴發落的罪惡。做了『衆矢之的』者，也已經四五年，開首是『作惡』，後來是『受報』了，有幾位論客，還幾分含譏，幾分恐嚇，幾分快意的這樣『忠告』我。然而我自己卻並不全是這樣想，我以爲我至今還是存在，只有將近十年沒有創作，而現在還有人稱我爲『作者』，卻是很可笑的。

我想，這緣故，有些在我自己，有些則在於後起的青年的。在我自己的，是我確曾認真譯著，並不如攻擊我的人們所說的取巧的投機。所出的許多書，功罪

姑且弗論，即使全是罪惡罷，但在出版界上，也就是一塊不小的斑痕，要『一脚踢開』，必須有較大的腿勁。憑空的攻擊，似乎也只是一時收些效驗，而最壞的是他們自己又忽而影子似的淡去，消去了。

但是，試再一檢我的書目，那些東西的內容也實在窮乏得可以。最致命的是：創作既因為我缺少偉大的才能，至今沒有做過一部長篇；翻譯又因為缺少外國語的學力，所以徘徊觀望，不敢譯一種世上著名的鉅製。後來的青年，只要做出相反的一件，便不但打倒，而且立刻會跨過的。但僅僅宣傳些在西湖苦吟什麼出奇的新詩，在外國創作着百萬言的小說之類卻不中用。因為言太誇則實難副，志極高而心不專，就永遠只能得傳揚一個可驚可喜的消息；然而靜夜一想，自覺空虛，便又不免焦躁起來，仍然看見我的黑影遮在前面，好像一塊很大的『絆腳石』了。

對於爲了遠大的目的，並非因個人之利而攻擊我者，無論用怎樣的方法，我全都沒齒無怨言。但對於只想以筆墨問世的青年，我現在卻敢據幾年的經

驗，以誠懇的心，進一個苦口的忠告。那就是：不斷的（！）努力一些，切勿想以一年半載，幾篇文字和幾本期刊，便立了空前絕後的大勳業。還有一點，是：不要只用力于抹殺別個，使他和自己一樣的空無，而必須跨過那站着的前人，比前人更加高大。初初出陣的時候，幼稚和淺薄都不要緊，然而也須不斷的（！）生長起來纔好。並不明白文藝的理論而任意做些造謠生事的評論，寫幾句閑話便要撲滅異己的短評，譯幾篇童話就想抹殺一切的翻譯，歸根結蒂，于己于人，還都是『可憐無益費精神』的事，這也就是所謂『聰明誤』了。

當我被『進步的青年』們所口誅筆伐的時候，我『還不到五十歲，』現在卻真的過了五十歲了，據盧南（E. Renan）說，年紀一大，性情就會苛刻起來。我願意竭力防止這弱點，因為我又明明白白地知道：世界決不和我同死，希望是在於將來的。但燈下獨坐，春夜又倍覺淒清，便在百靜中，信筆寫了這一番話。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九日，魯迅于滬北寓樓記。